



2012 年 1 月 31 日创刊 2016 年 7 月 30 日第 73 期

本期目录

《北京地质学院文革专辑 3》

生逢乱世

李颖 记录整理 蒋良朴在校友座谈会上发言纪要

蔡新平 记忆中的肖力与北京地院文革

庄一龙 文革中在地院、上海和北京的几件事

忆旧思亲

何建勋 怀念几位“东方红”难友

故纸堆

徐小青 录入 北京地院革委会整“高安反革命小集团”的一份大事记

【生逢乱世】

蒋良朴在校友座谈会上发言纪要

李颖 记录整理

说明：蒋良朴是北京地质学院勘探系 61 级学生（文革开始时已是五年级，即将毕业），文革中组织勘探系造反派学生加入东方红公社，任东方红公社核心组成员，副总指挥（总指挥朱成昭）。后追随朱成昭反中央文革，1967 年 6 月在逃出北京后又被中央文革抓回交地院革委会关押批判。当年 11 月 2 日，与朱成昭、叶向真等一起被公安部以“组织反革命集团”罪名正式逮捕。后辗转关押于多个监狱，屡遭酷刑。1975 年 5 月释放后又被押送煤矿劳改。1978 年以刑满名义释放。1981 年在胡耀邦的过问下始得平反。后回中国地质大学（武汉）任教，1993 年“下海”经商。2011 年 2 月 26 日在北京中国地质大学交流中心会议室召开的一个小型座谈会（有 20 多位原地院的老师与老同学参加），老蒋作了长

篇发言。以下按他的发言提纲整理。

老朱(朱成昭)离开我们 13 年了,他在走之前三小时给我打了一个电话(1998 年 9 月 25 日晚上 11 点多钟),他说:老蒋,我要走了,我要干的事恐怕干不完了,你们下面接着干吧……

我想,把北地(北京地质学院)文革史写好也是他的心愿吧!

剩下的,我们对这件事要有紧迫感,我们剩下的这一大批人是文革的当事人、见证者,是那个时代留下的宝贵财产,要抓紧时间……

写文革史,我想到的基本原则是:

一、真实性:写出历史的本来面目,不夸大、不捏造;

二、和谐性:不带观点,不评是非,顺着历史走过来了,老朱、老蒋、大宾、老蒯都是历史相处友人,都是朋友……

三、我们写的是民间文革史:可以正常发挥……

四、要体现历史价值:要经得起世代的考验。

时间跨度要大一些:前文革时期 10 年(学毛着、搞四清……),文革时期 10 年;后文革时间至今又经历了 40 多年。文革中哪些人物有丰富的辛酸苦辣,可以写得很生动,可读性很强……

今天与大家是四十五年后的第一次见面,我想谈下面三个大问题,只能提纲性谈谈,占用了大家时间,谢谢!

第一部分 我在文革中的基本情况

一、在学校的基本情况

(一)陈伯达(1967 年元月 23 日)倒朱批示前的情况:

1. 紧跟毛的路线,批资反路线,成立东方红,四进地质部,批斗彭罗陆杨……

1966 年我们批斗彭罗陆扬大会时,周总理指示,要保护老干部。

于光远在《我的文革》中写到,在这场批斗中,地院东方红对我们最好,保护我们,没坐飞机,没打骂。

2. 后来走向反面,元月中在梅建民家开反文革黑会,张九九也参加了,准备向中央文革写大字报;

3. 1967 年元月 23 日陈伯达到地院下达倒朱批示:听说你们要与中央文革斗,我劝你们不要这样,你们就会掉进茅厕,自作自受……

(二)陈伯达批示之后的情况

1. 1967 年 2 月初,朱成昭抛出“八大观点”:文革太左;运动群众;打击

面过大等等。紧接朱、蒋、杨（杨雨中）发表了五点声明……

2. 1967年2月19日，朱、蒋逃到上海，当日中央文革命令朱返京；
3. 1967年3月6日戚本禹要朱成昭“闭门思过”一个月，以观后效；
4. 5月1日朱、蒋等人去周家花园野餐庆五一（有诗一首——野餐记）；
5. 5月上旬蒋赴成都（当时武斗正盛），想为上台立新功。

（三）关于广州之行：

1. 6月初，朱提出为避免揪斗外出游玩（广州）。由杜金山去筹备，叶向真同往。因无钱只买了两三张票，共有8个人，躲在厕所内逃查票，而传言我们要投敌叛国……

2. 朱一出发，上海、广州警司就行动抓人。6月10日朱由公安部于桑副部长带回北京。但我们一行被送广军疗养院玩了二天，逛了广州从化瀑布，就被送回北京。狱中有追忆诗三首：《登两樵山》（《登两樵山》和良朴——朱成昭 79年2月2日）、《为水帘洞咏歌》、《游泳》。

（四）1967年8月朱在政协附近华嘉胡同8号度过一段时间。

（五）1967年8月下旬我到上海避难：

1. 途经济南，去找我大嫂，她帮我洗衣服，给路费，带我去游趵突泉，后狱中有追忆诗一首《趵突泉记》，反映逃亡生活。

2. 与朱成昭欲赴黄山游玩，途经杭州，求友不济，后回上海。在狱中有追忆一首《黄山行》。

3. 1967年10月12日由上海返京，被学校关押写材料，住原周守成（原地院副院长，文革被搬出此房）家。

4. 1967年11月2日被公安部正式拘留，送北京第二监狱。

二、在狱中的基本情况

（一）1967年11月2日——1969年1月29日被关在北京第二监狱（功德林）。

1. 身体摧残：伙食费每月5元，开水漂白菜，每天两餐，两个窝窝头。12月10日才在走廊上有一个火炉，狱内马桶结冰，披着被子坐着睡。

2. 精神摧残：剃光头，放风（与朱有暗号），24小时不定提审，脸上标“枪毙”等等；

3. 放风与朱暗号联系。

（二）1969年1月29日转北京第一监狱（大观园边上）

1. 大约5月份开始有几个月伙食大改善，一天4个鸡蛋，大勺打肉一大盆。

2. 1970年春节后，我用马桶砸看守（上厕所刚蹲下，就要我起来），被反铐（吃饭不便），后改成前铐一年整，不洗澡，后来解开后衣服腐烂了，一条腿一

碗泥。

3. 被打的第二天，我绝水 7 天，绝食 9 天。我会唱京剧（花旦）《满江红》，唱了上句便会唱下句，看守都来听。

4. 一个神秘的夜晚，雷电大作，打破了窗玻璃：

——有人向我说话：你认为是怎么一回事？

——我认为是你在给我打电话。

——那为什么没电话你能收到我的话？

——我想了许久，“是因为你的思维控制了我的思维”

从这天开始，我就一发不可收拾：

——分析了文革的斗争形势，认为康生是中央文革一派的总头目。

——重新设计了万吨水压机

——为家乡设计了引水渠，引河水浇田（1980 年回乡果真有其事）。

——论述了“石油成因”、“思维本质”、“生命本质”、“无穷大”以及一些哲学问题。

（三）1971 年 12 月 9 日转秦城监狱

1. 蒙头专车送北京郊区山地秦城监狱；

2. 房子大了，伙食也好一些；

3. 1974 年初，伙食大改善，另转大房间，肚子小了，吃不下了！

4. 1975 年 5 月放了，回武汉地质学院。

叶向真只坐了 4 年，总理保她，就出去了。

（四）从秦城放回到武汉地质学院

1. 享受战犯待遇，出狱有一套新制服，我没穿！

2. 回武汉地质学院（武汉航空路地质学校）有专人专房看管。

3. 几天后，高院长（原地院校长高元贵）找我谈话：你的问题未定案，安心等待……

4. 6 月上旬王焕（原地院书记）找我谈话：准备送你去农场劳动。我不拒绝……（此时朱成昭、张华府、颜宽均已送农场劳动。）

5. 6 月上旬，中央二办林克等赴武汉宣判：不认罪，发送劳改农场劳动改造 3 年。我拒签字，被打，喊口号……

三、劳改农场的基本情况

1. 1975 年 7 月 12 日，专车送到湖北襄北农场劳动改造（煤矿）；

2. 管教指导员张明千说：你是中央送来的政治犯，坐了八年牢。身体不好，能干就干，不能干就坐在旁边休息。

3. 所以狱友很尊重我，没让我为难。
4. 上完一个班下来，只见两只眼睛，衣服是代代相传……
5. 饭量惊人，一个月吃粮食 89 斤（狱友可送定量）；
6. 因为为人正直，被大家选为班长（人人服啊）；
7. 力大无比：2×2×1 见方大石头，几锤就砸开；
8. （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绝食三天，写了《卜算子》，被批斗；
9. 1978 年 5 月 10 日刑满回校：存钱买了一套新衣服，余现金二百多元。

四、刑满回校

1. （学校）有关人士说：你是反革命，早被开除了，不能收留。
2. 地院招待所范老师（原东方红的）收我住下。
3. 唐咸正、邵洁莲老师热情接待。
4. 朱成昭母亲来武汉，找到陈丕显（与朱父亲是战友关系），送材料，陈命省组织部叫朱（成昭）、张（华府）、颜（宽）等回学校。
5. 胡耀邦在两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过问此事。
6. 学校由陈安民、任继承组成审查小组平反。陈告诉我：你们这个案难翻过来，是中央定的，当时五个政治局委员都签了字（包括总理），你和朱成昭是内判了死刑的。
7. 当时胡耀邦将我们与张志新列为全国两大典型案，欲加以宣传，被叶帅勾销。佳运擦肩而过……
8. 考虑到工作与生活，当时我边搞平反边到教研室听课，专业底子（原是五年级学生）还可以，捡起来很快。1981 年一平反，我就可以上课（教学）。
9. 1981 年—1986 年当老师讲课，1986 年—1992 年到出版社，后任副总编辑；
10. 我姐、兄、母的态度
11. 1993 年初下海经商——搞图书出版、销售（略）。

【生逢乱世】

记忆中的肖力与北京地院文革

蔡新平

《昨天》编者按：本篇摘录自作者正在撰写的长篇回忆录。

一、前言：日记、档案与记忆

早就有人让我谈谈有关肖力到地院来的事情，迟迟没动笔。后来看到了其它几位校友的回忆录中有涉及肖力与地院文革的内容，感觉与我的记忆对不上。虽然我现在的记忆也自感不一定可靠，很多细节都已模糊，但几个关键点的印象还很深。随着大脑的老化，再不记下来恐怕今后就更说不清了。

如果有日记参照就好。以前我有记日记的习惯，从高中到大学三年级，共有六本，就放在我床头书架上，文革初期被专案组给抄走了。因发起反工作队的6·20游行，被地质部派的工作队打成了反动学生，设立了我的专案组，撤销了我班长职务，并在全校广播宣布（同时撤职的还有三个同学。以此惩罚反工作队的学生。工作队驻校期间，好像就干过这一次）。我的专案组成员除了工作队的人外还有我们班的几个同学，为首的是班团支书。平时我们俩关系还真好，我大学的第一个寒假不是回湖北老家，而是去了河北农村他的家。我城市人的洋布衣服给他穿，他农村家织的土布衣服换给我穿。但再好的友谊，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如同一张薄纸不堪一击。有人告诉我，我的日记就是他们抄走的，但没人认账。

目睹了太多因日记而倒霉的人，从那以后，整个文革十年，我就再也不记日记了。但活动中还是积累了一些文字材料。1968年3月和5至6月期间，聂树人、王大宾控制的地院革委会以清理阶级队伍和反击二流派为名，多次发起对“高安郑江”和“蔡派”骨干的抓捕，很多老师同学都被关押和抄家，我侥幸逃脱，直到军宣队进驻后我才回学校。回来后发现我“一无所有”了，几乎所有的各种记录本，积攒的各种资料，小报，包括读过的几本马恩列斯毛的著作，上面有读书时留下的批注、心得等，一样都找不到了，仅有“仓促出逃”时随身带的两个小本保留了下来。如果毕业后能够及时做些追记，可能对现在的回忆会有帮助。

从1968年分配晋东南长治212地质队，到1978年考研究生离开，十年里什么也没写。地质队的这十年里总的运气还不错，也就头一年被整一段时间，但很快就翻身了。从没有写过什么交代，因此也没有留下什么有价值的材料。特别是在林彪事件后，对政治心灰意冷，对文革中的事已懒得回忆。新建的地质队革委会的党委书记郭雪虎，是李顺达派来的一个老县委书记，和我关系非常好，我们无话不说，成立党委时的工作报告都是我这个非党员给起草的，他让我写份入党申请书，被我婉言谢绝（后在1995年前后我获得了种种荣誉，也曾经有类似机会，我也同样放弃了）。1978年考取中科院地质所研究生，毕业后留所，是老所长张文佑的得意弟子，开始也顺风顺水，被委托负责组建全所当时最大科研项目¹，因经费多，人人眼红。

¹ 国家“75”能源重化工基地重大攻关项目：“晋中、晋北四矿区中深层岩溶地下水资源合理开发利用研究”煤炭部委托组织，中科院地质所和山西煤田水文地质队共同承担，总经费3000万，地质所直接支配900万。

到1985年全国开始搞清查“三种人”的时候，恰逢张先生去世。当所里撤了我项目负责人并要我写文革交代材料时，我还以为是因为张先生去世，他们要夺我课题经费而找茬，我不配合。在僵持一段时间后，他们给我看了一份中组部的红头文件，文件指名道姓将我列为审查对象，文件列述了我在文革中的简历，包括我岳父“可能是部队高级干部”也写上了。文件系统列举了从1966年6月到1968年军工宣队进院之前地院“东方红”所干的一切有名的“坏”事，如驱赶工作队、发起组建“东方红”、四次冲击地质部、抢广播电台挑起武斗、抢民委档案、火烧英国代办处、冲击天安门金水桥、围困中南海的“揪刘火线”、抓彭德怀、“东方红”和首都三司驻外联络站有关的各地武斗、抢军火库、电台事件……有些都是我根本不曾听说过的事件，林林总总，我已都记不清了，有二十多项吧。其它还有我到东北去串联的事，等等。要求查清我在这每一个事件中的表现、作用、影响，并做出结论。从此我的好日子也就到头了。专案组一年多时间内查外调，一遍一遍要我写交代材料，短短几个月我就白了头。因我在“东方红”总部一共就干了三个来月，绝大多数“东方红”的事件都与我无关，“交代”其实并不难写。但因离文革开始也过去快20年了，很多事情的记忆已经模糊，再加上是写交代，“宜粗不宜细”，能糊弄就糊弄，所以留下的东西也是比较粗糙的。这些交待材料的草稿我还有，但价值不大。

在审查我的过程中，我亲眼看到我所党办的办公室里至少有三铁皮柜装有对我内查外调收集来的材料，其中从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复印回来的文革档案资料占有最重要地位，数量也最多。能够看到这些东西也纯属偶然。1986年4、5月，专案组给我写了审查结论要我签字，据说审查结论要与被审查人见面，签字是必须履行的手续。我发现有许多不实之词，我说你们都内查外调一年多，明明没有的事，你们还要胡写，我绝不签字。一直拖到了上面催要的最后期限了。专案组长石玉泉，当时是所党办副主任，南大文革期间毕业的，据说是南大保守派的一个头头，因此我当时就有一种“老保搞报复再整造反派”的感觉，所以也不买他的账。石玉泉急红了眼，要我具体指出哪些内容不实，我说比如这一条，说我是二进地质部的发起者、组织者，带头冲击国家机关，揪斗何长工等地质部革命老干部（这罪名很严重的啊！），就是不实之词，这个结论就是错的。当年我恰好是反对二进地质部的，我没有斗过任何一个老干部，别说何长工，就连直接整我的邹家尤我也没有斗过。石玉泉说是你自己写的材料交代承认的，白纸黑字。我说如果你能把这份材料找出来给我看，我真是这样写的，这个结论你爱怎么写就都随你便了，否则你就得推倒重写。“看来你还真够狂的，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于是就把我带到他办公室，开始打开铁皮柜找材料。虽然故意挡着我不让

项目顾问张文佑、沈尔炎，项目负责人蔡新平。

看，但我也瞅了个大概。抽出来塞进去，抽出来塞进去，直到翻到第三个铁皮柜才从中拿出了一份材料，这是1968年初我在北京市委党校首都高校两派头头学习班，按要求各自做自我批评时写的材料，有十多页，标题就是《我的自我批评》，其中有一项就是检查自己在二进地质部时犯了右倾错误，题目是“我为什么反对二进地质部”。我一看就乐了，我说：“标题就是我反对二进地质部，你识字吗？”他说你别得意，你看，你说二进地质部是革命行动。我说再往下看，“周总理的这个指示，使我认识到自己在这问题上的确犯了错误”，那可是周恩来说的，不是我说的，因此我才不得不检查自己犯了右倾错误。我看到这份材料的页面码已经编到1000多页了，我当时就对石玉泉说，这些材料你可给我保管好，将来我还用得着。

有了这一回合，对于他每一条我认为是错的，我都要他找出证据给我看，他找不到，没办法，就说你自己写吧。我一晚没睡，重新给自己写了“结论”，一早交给他们，让他们去誊清。我说你们要给我改回去一个字我都不签字。因为我写的很客观，有就是有，错就是错，没有就是没有，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专案组的三个人关起门商量了半天也没有再说什么。他们誊清完了后我在签字时还添了几条说明。胡耀邦时代政策还是不错的，要是换到其它年头，说你是你就是不是也是，你还敢顶嘴？结论往档案袋一装，谁知道写的是什麼？近几年我多次到所里党办，人事处和档案室，想找到这几铁皮柜材料，为此还专门找了当时负责审查我的党委书记胡××，这老头脑袋也有些问题了，结果都是“记不清”，“查不到”。但我坚信这些东西一定还在。我们批判工作队，大闹地质部，其中最重要的内容是要工作队交出黑材料，销毁黑材料。其实这些材料根本就没有销毁，包括后来王大宾、聂树入掌权的革委会（他们已建有“高安郑”和“黑二团”的专案，都编了“高安”和“黑二团”的“反革命活动大事记”）和军宣队掌权期间形成的档案资料，我相信都不会销毁，只不过不会让我们看到。文革研究是禁区，文革档案的重要内容在现阶段肯定不会公开，否则研究文革、写回忆录就不会这么艰难。这里插一句，我最近从中共中央组织部干审局编的《干审工作政策文件选编》中看到了关于清理“三种人”的一系列文件。其中就有不要销毁文革中形成的档案材料的通知。特别是中组部、中宣部、教育部《关于“文化大革命”期间高等院校学生造反派组织重要头头记录在案工作的意见》（1983年4月23日，中组发〔1983〕6号文），审查“三种人”的材料也是必须归档的。文件也强调了“应该就基本事实同被记录人核对”，“审查结论要同本人见面”，“经过核对的记录材料连同本人意见一并存入本人档案”²。

我院保守派红卫兵头头程关林回忆录中有一段关于“黑材料”的文字，很

² 《干审工作政策文件选编》（下），中共中央组织部干审局编，党建读物出版社，1993年12月。P1385

有意思，摘录如下：

1966年8月上旬（工作队撤离后），胡守安叫上我，从木工厂后院挖出一包东西，我一看，是“反动学生朱成昭”及“反动学生蔡新平”的材料。转移到何处，还是销毁了，我没过问。我只是明白，工作组确实整了学生的黑材料，但我见到的也就是这两个人，真有先见之明。……“文革”初期，我与“东方红”头头打交道最多的是蔡新平。66年8—9月，我与蔡新平有过多交锋……

我估计，这包东西一定可能就在我外调档案里，其它就应当是地院东方红公社和革委会期间保留下来的东西。我奇怪的是，高校两派头头1967年底到1968年3月在市委党校办的学习班是市革委出面领导的，谢富治、李钟奇主持的。我是和王大宾作为对立面头头一起参加，我的“自我批评”检查材料是交给学习班领导小组的，肯定不是交给王大宾的，最后怎么落到院革委会手里而且也装进档案了？

由于动笔之前已经看到了其它人有关肖力的回忆，他们的回忆在先，当与自己的记忆有冲突时我还自话自说就不合适了，因此不可避免的要对他人的回忆内容做一些比较分析。孟繁华在整理自己的文革笔记资料时，发现记忆这东西有时很不可靠，明明当时的笔记是这样写的，可记忆中要么完全没有，要么很谬。我们在讨论中交换意见，深有同感。我在此声明，对他人的回忆中与自己的不一致的地方，虽提出自己的分析，但不做定论。对方回忆的内容可能是有的，是他们经历的一个侧面而我自己没有经历，问题也可能出现在时间、地点的错位上。不管怎样，对错都留给研究者们判断。

二、肖力何时来地院

目前我看到涉及肖力主要是殷惟侯和田春林的回忆，聂树人的回忆录中有关肖力部分，因不是他自己的亲历，内容有明显不合逻辑的地方，基本可以断定是后来写书时的臆想³，如说肖力总是穿军装来地院看大字报，自称自己是“中央工作人员”，等等，这里就不列举了。王大宾的回忆录有关肖力部分主要是引用田春林和我的回忆，但其中去平顶山部分是他经历的，比较详细，而我完全没有介入，这里也不讨论。我与殷惟侯、田春林的回忆的矛盾主要在两个问题上：一

³、“正当朱成昭等酝酿成立一个全院性群众组织的时候，……一个有‘闲瑕’看大字报的军人经常出现在大字报的席棚前，这本身就不同寻常。而且这军人还是个女的，20多岁，圆润的脸蛋上戴着一副精制的眼镜，聪慧漂亮，引人注目。……她的一身军人装束，……自称自己是‘中央工作人员’……对这个突然从天而降的中央工作人员，我们对她只有百分之百的信任，而没有丝毫的怀疑。”摘自聂树人《地质东方红兴亡史》第十三章（电子版194页）。

个是肖力第一次来地院是什么时候，或“东方红”总部的人第一次见肖力是什么时候？第二个是“东方红”总部的头头最早是在什么时候知道了肖力的真实身份？

关于肖力来地院时间的第一个版本是殷惟侯的⁴，他写道：“‘东方红’成立不久（按：是‘东方红大队’还是‘东方红公社’，原文没有指出），一天，我在学九楼前看大字报，边上有一位高个子，穿普通灰色两用衫的女同志向我打听：‘东方红’是怎么回事？我向她简要说明后，她问我：‘东方红’在哪里办公？我问她：您是谁？她说：我叫肖力，是解放军报的。我就把她带到教四楼201‘东方红’队部，把她介绍给朱成昭等头头。很多天后才知道：肖力是毛主席的女儿李讷。有人回忆说肖力第一次来地院穿军装、说自己是北大的，与我的记忆不符。如果她是北大的，我只会给她指路，不会专门陪她去队部。”

第二个版本是田春林的⁵。他回忆肖力来地院“发生在1966年的7月底、8月初，工作队刚撤离地院。时间正是在‘东方红’战斗队成立的前后几天”。（按：工作队是1966年8月13号撤离地院的，“东方红”战队是8月8号成立的）。在教四楼“东方红”战斗队的办公点，是负责接待的贾维谦给领到总部来的。他描述了初见时的情景和外表，如穿什么戴什么长什么样，走路怎么样等等，来人自称是北大历史系五年级学生等（按：王广宇、阎长贵的关于肖力的文章说肖力65年就已经毕业了⁶），拿出了陈伯达写的条子：“兹派肖力同志为中央文革小组驻地质学院文化大革命观察员 陈伯达”。由此建立了联系。

这两个版本说法中似乎是两个肖力，都是第一次来地院，前一个自称解放军报社的，后一个自称是北大5年级学生，一个是殷惟侯领进的，一个是贾维谦等接待人员领进的。两个人都说印象深刻，还具体描述了特征和当时情景。

可我的记忆版本和他们都不一样，而且也自认为印象深刻。我的时间地点内容都是可以确定的，因为它发生在地院文革史中的一个关键时刻：1966年8月23号，也就是地院“东方红”一进地质部当天。大约在下午3、4点钟，我刚从地质部回到教四楼（“东方红”的总部办公楼）不久，留守负责接待的同学（我已不记得是谁）就来找我，说有人要找公社负责人。他领进了一个女同志，指着向我介绍说这就是我们“东方红”总部的负责人，其它头头都去地质部了。没有寒暄，她直接问了我的姓名和肯定我是总部负责人之后，拿出了一封介绍信，介绍信是中央文革的红字抬头，下面有中央文革的大印。天哪！中央文革派人来

4、殷惟侯《北京地质学院文革点滴回忆》，2012-11，未发表稿。

5、参见《昨天》第54期地院专辑，田春林回忆录中“肖力”来地院一节。

6、1965年李讷从北京大学毕业后，没有分配工作，就去参加“四清”了。待她参加“四清”工作结束后，“文革”开始了，她没有回北大，留在妈妈即江青身边，1966年7月，开始参加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的工作，和工作人员住在一个楼里（因为她是工作人员中惟一的女同志，有单独的房间），后来她经常住在江青住的楼里。（《南方周末》：李讷在“文革”初期，2012-07-22 09:10 作者：阎长贵、王广宇）

了！我当时异常激动。信的样式我记不住了，但信的核心内容：“肖力”，“中央文革工作人员”，“了解文化大革命情况”，记忆深刻。当时我们的队伍在地质部正处在僵持状态，地质部领导对我们的要求不予理睬，纠集西纠、地院保守派红卫兵对我们围攻。我们“东方红”是“倾巢而出”，大约有八九百人，顶着日头，坐在院子的水泥地上，从一大早步行到地质部直到现在，没吃没喝已七八个小时了，甚至连上厕所都非常困难。西纠的皮带不时在头上挥舞，有的女同学被揪出队伍给剪了辫子（所谓的“破四旧”），有的同学被对立面指认为“狗崽子”被拉出队伍批斗。朱成昭已经将口号升级，在不交出邹家尤就绝不收兵的口号下，局面已陷入僵持状态，如果没有高层的支持，这个僵持局面就很难打破。

这要说一下当时的大形势。虽然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在8月5号已出笼，但并没有在社会公开，至少在地院我们学生中还没人知道。“16条”发表后，工作组虽已于8月13号撤离学校，但由于“16条”里没有公开给工作队的错误明确性，而是把工作队和领导分为四类，只有第四类才是坏的。这就给工作队掩盖自己的错误留下空间，他们自认为还是比较好的，顶多是好人犯错误，撤走时都安排了代替工作队行使权力的文化革命委员会（造反派称之为“伪文革”），并不真心给被整的学生老师平反。当时派出工作队的国务院各部委还没有一个领导被点名批判，政府机构还十分稳固，堂堂的国家部级机关怎么会向一群闹事学生娃娃低头？何况这些学生中很多是已被工作队定为“右派”、“反动学生”的，在部领导心中这就是“右派闹事”。让部党委把一个副部级干部交给这帮闹事的学生去批斗，在当时的情况下是根本不可能的。“东方红”总部“不达目的绝不收兵”的口号一出，队伍就完全陷入了被动，处境是进退两难。此时我们多么需要中央文革能够知晓我们情况，获得他们的支持啊！当时朱成昭已经派出了几拨人到各处去反映情况。

肖力的到来，这是不是我们的行动已惊动上面了？因此中央文革真的派人来了？这些问题在我脑子里迅速闪过。肖力问我去地质部没有？目前情况怎样？我急切地告诉了她我们的困境。在我回答后，她就继续提问，让我详细介绍东方红公社的发展状况，政治目标，组织章程，怎么组织发动群众的，为什么要采取这个行动，对目前的形势有什么分析，下一步有什么考虑，等等。听完后她对我们队伍能够很快发展到上千人很感兴趣，对参加“东方红”的人不限制成分特别赞赏，她说有成分但不唯成分论是党的一贯方针，你们的大方向是正确的，你们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是正确的，要进一步发扬，团结更多的同学，包括工人教员，要努力壮大队伍。

不超过一个小时她就结束了谈话，叮嘱我赶快回地质部去，把她的意见告诉总部同志，让我告诉大家，斗争才刚刚开始，要敢于斗争还要善于斗争，要有理

有节；要我告诉同学们，中央文革已经知道了“东方红”的革命行动，中央文革非常关心大家。她说很快会有人来解决我们的问题的，要沉得住气，要听从安排。我体会这意思是中央文革要派人来解决问题，听从安排就是听中央文革的安排。

于是我又很快骑自行车赶回到了地质部。到地质部时已是傍晚了。顺便提一句，文革期间我经常骑的一部自行车是曾婉娥，水文系五年级一个印度尼西亚华侨同学借给我的。

在我的记忆中，肖力就是在8·23这天来的地院，而且亮出了中央文革工作人员身份（而不是含义不清的“中央工作人员”）。在这之前她是否来过我不知道，至少是我没有见过，否则我不会这么惊讶。

三、我传达“中央文革三条指示”之后

到了部里，我记得我是站在一个凳子上，将肖力的谈话归纳为中央文革的三条意见向同学们做传达的。在困苦中的同学们由此获得极大鼓舞。地院保守派斗批改红卫兵头头程关林的回忆录中有一段文字，恰好可与我的记忆相印证⁷：“‘东方红’在地质部闹腾未果（指一进地质部），无奈之下，宣布绝食。我在那里保卫地质部，当然知道他们是在向中央施加压力，并无当年革命烈士在国民党监狱绝食的境界。所以，我令人从地质部食堂抬来两筐热气腾腾的白面馒头，几个人分头劝说‘东方红’的同学吃饭。眼看我们有所收效，刚刚赶到的蔡新平急眼了。他站到凳子上，张开双手吼叫：‘大家不要上当。我们绝食的革命行动已经得到中央文革的重视和肯定。’他接着讲了中央文革是支持他们的三条指示。不仅重新鼓起了‘东方红’同学的士气，我方顿觉：‘这下完了。’”

大约晚上8、9点钟，有人来让我们总部派代表到北京新市委去开会，实际是谈判。总部指定了十来个人，朱成昭要掌握队伍，让我负责带队去谈判。具体都有谁去已记不清了，但从殷惟侯的回忆录来看，有他，有黄平稳。殷惟侯写道：“一进地质部期间戚本禹召集地院两派在北京市委辩论，‘东方红’由蔡新平、我、黄平稳等十余人参加，具体情况记不得了，只记得黄平稳坐在我和蔡新平之间，他在水本子上写了：蔡新平侃侃而谈……”不过要指出的是他的回忆中说是戚本禹召集，其实是北京新市委的领导陶鲁笏召集主持的这个会，是否戚本禹参加了我已没印象。如果戚本禹参加了，他应当会出面替我们说话，可我的印象这个会开得相当艰苦。参加会的有地质部副部长旷伏兆、胥光义为首的地质部有关干部，有地院校文革的负责人，有保守派组织斗批改和红卫兵的负责人，可能还有西纠的中学生，他们的人很多，会场乱哄哄的。谈判就像在泥淖中跋涉。会场上

⁷ 参见《昨天》54期，程关林回忆录

唇枪舌剑，争得不可开交。陶鲁笏和地质部领导根本不站在公正立场主持会议，大有坐山观虎斗的架势，都吵到大半夜了，他们的表态就那么一句话：“你们双方什么时候达成一致意见，我们就按你们意见办。”这实际上就是要看我们笑话，要拖垮我们。看来朱成昭给我预设的谈判目标暂时是达不到了，我想，我们必须要有个台阶下，要不近千的队伍就还得僵持在那里。我决定让步，按对立面的调子妥协，改批判会为辩论会，改让邹家尤接受批判为工作队和部领导听取两派意见。我心想，到了大会上，嘴巴是自己的，我爱怎么说他还管得着吗？辩论会和批判会有什么本质差别？听取意见和被批判你分得出来？退一小步是为了进一大步。直到半夜3点，总算达成了一致决议，内容大概是：① 8月24号晚上，由新北京市委领导主持，地质部领导、工作组领导都到地院去，参加听取双方代表发表对工作队的意见，不同意见可以展开辩论。② 具体如何组织会议，明天双方领导班子再协商，原则上主席团成员和参加发言的人双方对等，轮流发言。这就是8·24大辩论的起因。（下图：1966年8月24日凌晨，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一进地质部”后撤回学校。）



回到地质部，我把这个谈判结果向朱成昭汇报后，他对我的让步非常不满，说我右倾（这是他第一次说我右倾），我说当时情况下我只能如此，以退为进，先撤回去再说，辩论会上再和他们斗。朱成昭心里不痛快，但他也不可能有其它更好的解决办法了。在8·24大辩论获得巨大成功后，他又转怒为喜，一高兴就封了一个政治部主任的头衔给我，说斗争讲政治，讲策略，你干得不错。说蒋良朴敢打敢拼，有指挥能力，封了个副总指挥；王大宾能团结人发展队伍，封了个组织部长。早期“东方红”领导班子的核心基本上就是原东方红战斗队的核心，也就是朱成昭和我们这几个人，东方红公社成立后增加了各系联队的负责人。早期的东方红公社领导班子并没有明确的分工，组织机构没有成型。一进地质部和8·24大辩论后队伍迅猛发展，但也没有经过选举什么的，就是朱成昭口头这么一指定，大家也就这么认可了。如后勤部长朱德瑜就是二进地质部时朱成昭提议增加的，因为要解决吃饭问题，也同样被大家认可了。朱成昭是直接在地质部礼堂的大会上提议的，说看来作战后勤保障还真重要，我提议朱德瑜为总部后勤部长。大家鼓掌就通过了。作战部也是在一进地质部后才正式建立的。二进地质部由于斗争的发展，核心组成员扩大，各种机构进一步完善而且逐渐固定了下来。可以说领导班子是在战斗中自然形成

的，巴黎公社大民主选举根本不适合这种战时状态。

大约半夜3点多钟，我们和市委派的人一起回到了地质部，由陶鲁笳宣布了谈判结果，“东方红”也就决定撤回学校。陶鲁笳是如何宣布市委决定的具体过程我已经没印象了，可以参考聂树人的回忆⁸。

四、肖力与8·24大辩论

回校后，8月24号上午，“东方红”和校文革、“斗批改”又进行了艰苦的谈判，最后对晚上的辩论会的组织方式和程序达成了协议。这个谈判朱成昭全程参加了。辩论双方在主席台上各派两名代表，一名首席代表，一名主辩人，朱成昭是“东方红”首席代表，我是“东方红”主辩人。辩论会以我们的大获全胜而告终，辩论会后“东方红”队伍急剧壮大，是地院文革造反派与保守派力量转换的分水岭。

辩论的当晚，我和朱成昭一直在台上，对台下的情况不了解。事后大家告诉我，肖力当晚一直在台下观看辩论会，看到我们被围攻和坚定的斗争意志，看到我们后来的巨大成功，她几次都流泪了。我想这也因为是她介入高校文革运动打响的第一炮，是她高校“支左”的漂亮的处女作。她流泪一方面是感动，一方面是欣慰与得意，因此也是高兴的流泪。田春林的回忆录里专门记述了这个经过（见《昨天》第54期，田春林回忆录），当晚他和伏庆是陪着肖力。后来听说除肖力外，中央文革还有人观察了这次辩论会，传说江青、戚本禹曾经来过。

这里插上一段保守派红卫兵代表程关林写的回忆录，他写得比较简单，但符合基本事实，特别是他对陶鲁笳在大会中态度变化的观察很有意思，这点我们当时都没有注意到，直到现在看到了他的回忆录后才知道。程关林写道：

8月24日晚，地院操场西头搭了个台子，造反派、老保两派大辩论。中央派陶鲁笳主持会议，自然居中而坐。他右边是代表我方上主席台的任士田（斗批改）、程关林（红卫兵）、胡守安（工人赤卫队）；陶鲁笳左边是对方代表：朱成昭、蔡新平、蔡文怀（？）。这也是地院文革中唯一的两派同台亮相。

蔡新平振振有词地引用中央文革一个又一个最近讲话，但很快被我方几千人

8、到8月24日凌晨三四点钟的时候，从办公大楼东边门洞里走出来一个身份不明的年青干部说：待会儿中央首长要接见你们，你们的人到这个大楼门口集合。……，东方红总部负责人和骨干都齐集在东边那个楼门洞口，准备听取传达，……国务院工交政治部主任陶鲁笳传达中央指示：1、地质学院学生到地质部要求工作队领导回学校听取师生批评意见的行动是正确的，合理的；2、现在决定，地质部领导于今天晚上去地质学院听取师生意见，并对工作中的错误进行检查。3、师生如有不同意见，可以进行辩论。（摘自聂树人《地质东方红兴亡史》第十五章 一进地质部）

的嘘声所淹没。这时，朱成昭神情肃穆地起头：“暮色苍茫看劲松……”“东方红”几千人齐呼：“……无限风光在险峰！”上万人的操场笼罩在一种哀兵动人的气氛中。

我在辩论开始前还跟蔡新平就主席台名额、辩论次序等争得面红耳赤，此时，我颇有理亏心虚之感。

震惊北京的地院“8·24”大辩论以我方大败而告终。当晚，我派不少人就宣布退出红卫兵（或斗批改）。我方辩论组组长谷尚（上？）礼、副组长王××也被撤换。可以说，“8·24”大辩论后，院红卫兵已名存实亡，坚持的只是勘探系“红卫兵”等各系保守派战斗小队及工人赤卫队。

奇怪的是，一直支持我们，这次又主持辩论会的陶鲁笳，在辩论会前还热情与我方代表握手，还拍拍我肩膀。而当双方正辩论时，一个秘书模样的人向他递了张纸条后，他一下就如同泄了气的皮球，对“东方红”代表唯唯诺诺，低声下气。

因为辩论会的过程中，老保冲上台，对我又扯又打，不让我发言，说我父亲是叛徒，根本没资格当红卫兵，不能作为“东方红”的红卫兵代表，要把我轰下台。我记得我大声问台下：“东方红的战士们，我能不能代表你们？”下面异口同声大呼：“能够！”我向陶鲁笳表示抗议，要他主持公道，但他也只是说些冠冕堂皇的话，根本不采取实际行动。

就在拉扯的过程中，当我快被他们扯下台的危急关头，陶鲁笳在后面终于大声说话了，制止了即将发生的更大规模的揪斗（当时还相对文明，还不能叫武斗）。于是辩论又恢复了常态。趁此机会我做了半个多小时的激情演讲。整个会场形势急剧转变，首先是我们班的一个同学跳上台，当场表示要坚决参加“东方红”，我马上代表“东方红”欢迎他加入，并把我的“东方红”臂章给他戴上了。全场热烈鼓掌，更多人表示参加“东方红”。这个同学我已记不清是谁了，模模糊糊记得像是丁育民。恰好去年丁育民到我家来，我问他8·24大辩论你在场吗？他说老蔡你忘了，就是我第一个跳上台要求加入“东方红”的。还果然是他，我的不清晰的记忆得到了确认。丁育民后来是三司住沪联络站的办公室负责人，陪同张春桥参与了中央文革处理上海的“安亭事件”，又帮助总理处理新疆的“八楼事件”。他写有回忆录。

当晚的大辩论奠定了“东方红”胜利的大局，保守组织从此开始迅速瓦解。

程关林的回忆终于解开了陶鲁笳态度急剧转变之谜。是有人在关键的时刻向他发出了警告。具体是谁递的条子，条子的具体内容是什么？这都不重要了。可以肯定的是，一定是能够镇得住陶鲁笳的人，能镇得住他的不是国务院就是中央

文革，很可能就就是在台下观战的中央文革成员，这应当与肖力有关。

程关林后来还写道：

8月25日凌晨，我正为陶鲁笏在辩论会上表态支持“东方红”而恼火，祝天惠来电话，说陶鲁笏、李人林要接见祝、程等人。我正生着陶鲁笏的气，未去。一个多小时后，祝天惠敲开我的门：“国务院工交口是支持我们的，会上表态只是一种策略，因为中央文革的人也到了辩论会现场。今后调子要变……”

这就回答了我们的疑问。

可以肯定，正是8月23号肖力到地院，也可能去了地质部，观察调研后向中央文革，向周总理，甚至向他父亲做了汇报，这个汇报导致高层（可能是毛泽东、周恩来或中央文革）敦促北京新市委和地质部出面解决问题。学生冲击部委机关毕竟是第一次，作为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对这次冲击的性质当天并没有公开明确地表态，中央文革除了肖力，其它主要领导当时也都没有直接走向前台公开表态。这和后来的发生类似事件时领导人的应对方式有明显差别。后来频频发生的对中央机关的冲击事件，总理和中央文革往往都会有及时明确的表态，或肯定，或否定，或劝阻。如地院“东方红”的二进地质部，周总理就说了是革命的行动，而冲击民族文化宫，发生抢民委档案的事，就给予了严厉批评，指出是被坏人利用了。对于冲击国务院直属部委机关这样的事，这绝对是大国总理的噩梦，周恩来是绝不会鼓励支持这样的行为的，除非有毛泽东的表态。对我们这次行动，为什么一直拖到下半夜才解决问题，的确是有很深的背景，值得思考。当时的中央文革还没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步，薄一波、陶鲁笏和何长工们腰杆也都还不软，是很不心甘情愿向造反派低头的。程关林回忆录中描写的陶鲁笏在大辩论后对地院保守派说的那些两面色彩的话，也的确就是他们的内心话。如果没有高层发出指示，我们冲击地质部的行动就不可能取得成功。

五、肖力没有参与策划一进地质部

有人说肖力参与出谋策划了一进地质部，我没有这样的印象。在我记忆中，一进地质部就是朱成昭的创造。在我们讨论进军地质部及事前的全部活动中，完全没有肖力的影子。文革期间我印象中从来没有听人说肖力参与过策划一进地质部这样的话。现在有的回忆录中提出肖力参与了一进地质部的策划，或许只是一种推测，最大的可能是因为回忆录中把肖力来地院的时间提前到了8·23之前。因为殷惟侯和田春林回忆都说肖力在8·23之前就已经到地院来活动了，已经和

地院“东方红”头头们很熟了，那推测肖力参与策划也似乎顺理成章了。可她8·23下午来地院给我的感觉好像她并不很熟悉地院文革情况。如果她已经认识总部的人了，也已很熟悉“东方红”的情况，她就没有必要到地院来找人，她可以直接去地质部找“东方红”的头头下达指示就行（她的外表不会引起人的注意）。她也更没有必要出示介绍信，也没有必要问我那么多问题，还做出分析，说我们大方向正确，政治路线组织路线正确等等，还让我立即到部里去传达，向我们暗示了中央文革已经在着手解决这个问题。这实际是要我去鼓舞斗志，稳定军心，等待问题的解决，同时达到既向“东方红”、也向地质部和保守派群众亮明中央文革态度的目的。从程关林回忆录来看，还真的起了很大作用。

我这个肖力到地院的回忆的版本，时间、地点、过程等要点都是清晰的，而且有对立面的回忆录作为旁证。8·23下午我回到地质部，当我把这事都告诉总部成员时，我印象中没有听他们谁说早就认识肖力了，他们也都似乎是第一次知道中央文革来人了，他们的情绪和我一样兴奋激动。

（上图：1966年9月5日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二进地质部。这是6日冲击地质部办公大楼的情景。）



大闹地质部是朱成昭的一个大胆决定，他很明确地在总部对我们讲，我们地院不像北大、清华那么重要和有影响，不会有中央领导人到地院来，要揪邹家尤就得自己去找地质部，地质部一定要保邹家尤，事情一定会闹大，我们先礼后兵，口号开始不要太高，如果他们不答应，引起大家的愤怒了，就可以把口号升级。只有闹大了，上面才会有人来管，没有中央文革出面表态给地质部施加压力，要揪出邹家尤几乎是不可能的。果然他达到了目的。顺应大方向，抓住政治敏感点，采取过激行动，把事情闹大，给总理施加压力，给中央文革一个表态的借口，就获得了胜利。这个策略，在一进地质部后，朱成昭一再使用，而且多数情况下都很有效。如二进地质部、抢夺广播台等。

我认为在一进地质部之前，朱成昭和地院“东方红”中还没有人和中央文革挂上钩，也还不认识肖力。认为肖力参加了策划，那除非肖力和朱成昭是特级演员，首次大闹地质部是他们从头到尾瞒过了其它人合演的一出戏，这也太夸张了。

在二进地质部之前，我和朱成昭的关系还是很好的，和总部其它人关系也是融洽的，总部有什么大事一般我都知道，如果他们那时都已经知道肖力了（按田春林回忆，已经知道是陈伯达派来的中央文革小组驻地质学院文化大革命观察员，8·18后就知道她是主席女儿了），而我竟然一点不知，8月23号下午见到肖力时对她没有任何印象，她也不认识我，谈话中也没有感觉到她已经认识了总部其它人。“东方红”刚成立不几天，对外还没有任何影响，陈伯达就派肖力来当观察员，这种可能性不大。当时我们和其它一般高校的情况差不多，不像北大、清华等少数几个特殊的学校，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引起陈伯达的兴趣。

为此我在一次聚会时专门问过王广宇，王广宇当时是中央文革办事组组长。我问肖力刚到中央文革时穿军装吗？她外出活动穿军装吗？王广宇说没有。我说殷惟侯说他见肖力时（8月初）肖力说她是解放军报社的，王广宇认为这不太可能。他说肖力是9月底10月初才到解放军报社去的，在这之前她是中央文革的工作人员。他说肖力是江青、陈伯达明确安排到中央文革办事组来工作的，那段时间常到高校去活动，带中央文革的介绍信是很自然的事。我也问了，有没有可能带陈伯达写的条子？他想了想，觉得可能性不大。我也推测，一个不知其身份的人，给一个对陈伯达的字迹完全不认识的人看陈伯达的条子，看者怎么就能相信这就是陈伯达的亲笔信？写条子只能在身份相互熟悉的人之间才管用。在一进地质部闹出大动静之前，地质“东方红”组织也就是首都高校众多反工作队组织中的一个，那时地院这个学校不出名，“东方红”队伍也不出名，领导班子中也没有一个有特殊背景的高干子弟，朱成昭的父亲才是上海一个建工局副局长，顶多才沾点高干的边，也不是京官。“东方红”什么名气也没有，凭什么陈伯达亲自派肖力来？再说了，一个你毫不知底细的人拿一张只签陈伯达名字的纸条，没有公章，就代表了中央文革，这似乎不合常理，谁能够断定那条子或签名的真假？

我的印象中也只是在8·23这次接触后，我们才开始了与肖力的频繁交往，包括二进地质部时她和我、朱成昭几次见面谈运动的问题，她帮我们分析，提醒我们要注意的问题，这些我多少都还有一些记忆。

有一天肖力把我、朱成昭，可能还有蒋良朴，从地质部叫出来谈话，我们在地质部附近的一个小饭店要了一碗汤，几个烧饼，这次吃饭的事让同学看到了，传开后说总部头头不和战士同甘共苦，大家挨饿，头头下馆子，使我们很尴尬。最近看了印红标1990年采访我的录音整理稿，里面对二进地质部期间肖力的接见和谈话都有记载。

六、肖力在地院会见蒯大富

网上传有宋永毅的文章《朱成昭——一个红卫兵运动史上不应当忘却的名字》，他写道：朱在采访中告诉他：“‘首都三司’从来没有设立过‘司令’一职，但他当时是实际上的‘第一把手’。当时蒯大富仍然在清华大学受压，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多次要他设法支持蒯大富，以‘减轻中央压力’，他当即派过一支地院‘东方红’的战斗队去清华帮助蒯组织队伍。”周总理和中央文革是如何向朱成昭交代的，由于朱成昭的去世已经不可能还原。但肖力要朱成昭支持蒯大富，我们派人到清华去给蒯大富助威却是真实的故事。这在印红标 1990 年采访录音整理稿中也有较详细的记载。

一进地质部后，肖力和我们建立联系。23 号那天她是持介绍信到地院来的，已经亮明了她中央文革工作人员的身份，尽管当时我们还不知道她是毛主席女儿，但在事实上已经表达了中央文革支持地院“东方红”，支持“东方红”造地质部的反的立场。当天她没有机会和“东方红”总部其它成员见面，8·24 那天晚上也仅见过个别的人，这之后她很有必要再到地院“东方红”总部来会会大家。8·24 大辩论后，地院“东方红”名声大震，北京市高校，外地来京串联的学生，都纷纷到地院看大字报和到“东方红”总部接待室访问，每天车水马龙。肖力也时不时就会来地院。来时一般都没有事先联系，她总是先在校内转转，看看大字报，也偶尔和同学聊聊，然后到教四楼来。总部办公室人员流动不定，不同时候和她见面的人会有变化，经过几次后，总部大多数人都已经认识肖力了。

有一天朱成昭和我都在，她很直接地问有没有清华的同学到这里来串联，不知道蒯大富的消息。我估计她是刚去过清华，没有找到蒯大富。朱成昭说蒯大富就藏在地院，我当时也一愣，我说我还不知道老蒯躲地院了。朱成昭说，老蒯让保密，知道的没几个人。肖力一听就说快把他找来。朱成昭向一个同学交代了后，很快就把老蒯找来了。

我是第一次见蒯大富，瘦脸尖下巴，戴副眼镜，事后我还说过，怎么长得像我们班的杨××（我班的团支部书记）。老蒯激动地与肖力握手，肖力却很平静地看着他。她对老蒯说，在清华找不到你，听说你躲起来了，原来你跑到地院来了。相互没有什么寒暄介绍，感觉好像他们可能已经认识。老蒯说清华的老保红卫兵疯了，到处在抓人，学校现在比工作队时还恐怖，叫他们逮着就没命了。清华没有我藏身之处。肖力说，蒯大富你不要忘记，你的阵地在清华，你要尽快回到清华去。老蒯说我在清华臭得很，没有战斗队敢要我。肖力说你要向地院“东方红”学习，没人要你，你自己不会组织队伍？朱成昭，你们要帮帮他。朱成昭

说一定大力支持，需要我们时只管来找我，找老蔡和总部其它人都行。谈的时间不长，肖力就和蒯大富一起离开了总部，他们之间是否还有谈话就不得而知了。

蒯大富是怎么到地院的？前不久清华 105 周年校庆时蒯大富请清华红教工的老师聚会，鲍长康参加了，地院陶世龙老师（已故清华红教工托德坚老师的丈夫）也参加了。他们谈到了老蒯到地院的事。事后陶老师告诉我，鲍长康在地院有一个老乡同学，是他把老蒯带到他这个老乡那里住下的。我问了田春林，这个同学是勘探系 63 级的，红色尖兵战斗队的，叫奚戎，现在海口。

在二进地质部期间，有一天蒯大富来找我们，说他正在筹建井冈山红卫兵，他谈了他的处境和进展情况，要我们给他助威壮声势，朱成昭让我去安排一下。当天我们派了几支战斗队，夜里从地院出发，差不多上百人，几部平板车，拉着大字报纸，胶水浆糊墨水，一晚上就将清华主要的大字报席棚区糊满了支持蒯大富的标语口号，那晚我跟着去了，顺便看了看他们的大字报，确实感到老蒯在清华还没有火起来。到 9 月 23 号清华井冈山红卫兵开成立大会时，地院那天正好发生了抢广播台的事件，总部几个主要头头都没有去，但还是派了几个战斗队去助威。这个情况在吴鉴的回忆中也提到了。最近看老蒯的谈话，也说道这情况：

“之后，朱成昭、韩爱晶他们就鼓励我成立一个组织，说你干革命没有组织怎么行？我说我在清华被整得太臭了，学校里没人敢跟我跑。他们就说，我们支持你。我听了他们的鼓动，动员了一些人参加了我的组织。9 月 23 号，我们宣布成立清华‘井冈山’。成立大会在清华的礼堂召开，也就几十个人。不过，地院来了几百人，北航也拉来几百人，全部靠外校的人来壮声势。”⁹

1966 年 9 月 6 号，蒯大富在三司成立大会上宣读誓词，但他那时还没有拉起队伍，还是“光杆司令”，按常理他不可能进入三司的核心圈子。串联三司时，周永璋在清华联系的是唐伟，唐伟代表清华的八八串联会（清华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当时一共有十四个学校的反工作队的组织参与组建首都三司，代表清华参加三司的只有唐伟。在学校里蒯大富要加入“八八”，“八八”硬没有让老蒯参加。在正常情况下，三司的成立大会是轮不到由蒯大富来宣读誓词的。肖力与蒯大富谈话后一再嘱咐朱成昭要帮蒯大富一把，不过仅仅是朱成昭个人的面子，也不见得就能把蒯大富送到三司成立大会去宣读誓词。如果如朱成昭对宋永毅说的那样，周总理有过扶持老蒯的意见，那分量就不一样了。我推测请蒯大富宣读誓词很可能就是中央文革，或者就是周总理本人的直接指示。想想当初周总理亲自到清华去解放蒯大富，受主席之托连续召见，彻夜深谈，蒯为毛提供了打倒刘少奇的炮弹。周对蒯倾注了特殊的关切和寄予期望。借首都三司成立的声威来扶持

⁹、《蒯大富：在文革浪尖和人生低谷中摆渡的人》，作者：田炳信，原载于： 新华网

老蒯一把，这是很可能的。此外，三司是由地院周永璋负责串联起来的，周永璋和蒯大富又都是苏北老乡，三司成立大会是由周永璋主持的，在有上面的指示和朱成昭的关照的情况下，周永璋特意安排老蒯宣读誓词的程序，就是合情合理的了。这之后老蒯在清华就有了名分，胆子也就渐渐壮了起来。随着三司的迅速壮大，声望人气和在中央文革心目中的地位不断提高，蒯大富头上的光环也就更加耀眼了，以至于外界很多人都以为蒯大富就是三司的“司令”。但老蒯有自知之明，他从来没有这样说过，而且还向人解释这是个误会。

三司成立大会的前一天，9月5号，地院“东方红”发起了二进地质部行动。我们对地质部提出的要求在当天就遭到了部领导的拒绝，第二天就爆发了对部办公楼的冲击（揪邹家尤），地质部召集了地院“斗批改”、西纠红卫兵、部职工，还调来了一些工人来保卫地质部，双方发生了激烈的攻防战，所以9月6号当天，朱成昭、蒋良朴和我都没有去参加三司成立大会，总部安排了王大宾，田春林去参加了大会。

七、什么时候知道了肖力的真实身份

我们是什么时候知道肖力的真实身份的呢？目前也有不同的版本。田春林最初的回忆是这样的：

肖力真实身份的确定是由于8月18日毛主席第一次在天安门检阅来京串联的红卫兵，那天朱成昭受邀作为「东方红」的代表上了天安门，当毛主席从天安门城楼休息大厅走出来时，发现搀扶老人家的是一位青年女军人，当朱成昭仔细端详时她当时惊呆了，天哪，那不是肖力吗？她怎么搀扶着毛主席，她和主席是什么关系？这时传来了革军子弟也是「东方红」老战友张玉晋的声音，他告诉朱头，肖力是毛主席的小女儿李讷，这时朱头激动万分，原来如此，怪不得我们听肖力的点拨步步得胜，炮炮打得准呢。朱头回来后在第一时间把这个消息告知了核心组的几个人，大家别提多高兴了，我们的腰杆更硬了，我们是通天的，我们的后台是毛泽东看你斗批改还能蹦跶几天。肖力是不是中央文革成员并不重要，陈伯达签名的介绍函也不重要，重要的是肖力的特殊身份，她来自于中国的第一家庭，她是毛主席的女儿，与其说是陈伯达中央文革派出的文革观察员，不如说她是毛泽东的文革观察员，只此一点就足以具有地震效应了。（在正式发表时田春林已经对这段回忆内容在时间上做了修改。和我后面叙述的时间一致了。）

但我的记忆告诉我，我们知道肖力就是李讷，就是主席女儿这一特殊身份，是朱成昭在二进地质部期间上天安门之后，时间应当是1966年9月15日，在这之前朱成昭还没有上过天安门。8·18第一次接见时，能够上天安门的好像还没有几个造反派头头的身影。8月17号地院东方红公社刚刚宣布成立，既没有多大势力，也没有多大影响，连一个有点名气的高干子弟都没有，怎么可能邀请上天安门？地院东方红公社是一进地质部后才开始扬名，二进地质部实际上已得到了中央文革的暗地支持，请朱成昭上天安门就是特别的鼓励。那天朱成昭上天安门回来后，兴奋地告诉我们，在天安门城楼上他见到了肖力，知道了肖力就是“小李”，小李就是李讷，李讷就是主席和江青的女儿！他兴奋地说：我们通天了！他在地质部礼堂向大家传达介绍时，“东方红”战士全场欢呼雀跃，高兴之极，受到了极大的鼓舞，这个场景留下了照片。（右图：朱成昭在地质部礼堂向东方红战士报告上天安门见到了肖力，知道了肖力是主席女儿的喜讯。拿话筒的是朱成昭，旁边鼓掌的是蒋良朴，蒋良朴边上是田春林。下图：听到这一喜讯后的欢腾场面。）



大约在1966年10月后，“东方红”总部的头头都常驻地质部了，肖力也就不来地院了。后来我们知道她去了解放军报社。1966年11月我正式退出了“东方红”总部。这之后，我个人、有时和其它人还多次去解放军报社找过肖力。记得有一次是为彭小

蒙的事，彭小蒙在北大被批斗，批斗完了后被单独关押在一个房间里。我和杨淑荣、殷惟侯去看彭小蒙，主要是想让她给我们谈朱成昭与他们之间交往的情况，彭小蒙托我们向肖力反映她的处境，希望解救她，我们答应了，这之后彭小蒙还真给放了。有一次是和周永璋、刘富元为三司的事（周永璋在三司被朱成昭夺权，刘富元抢了三司大印），为此向肖力反映情况，我记得肖力当时批评了刘富元。有一次为朱成昭的事去见肖力，记得我还问过她：朱成昭说你曾经要和他一起去串联，是真的吗？肖力只笑了笑，既没有肯定，也没有否定。在1968年3月6

号和3月11号中央领导接见北京高校办学习班的两派头头时，肖力都在场。（从王广宇和阎长贵的回忆知道，肖力1968年3月又从军报重新调回中央文革办任组长¹⁰）。3月6号那次接见中间休息时，肖力和我们说了不少话，下面摘录笔记本中的一段记录：

肖力（对蒯）：你们红卫兵造反都好几年了，就是这样子，伯达开会开宗明义，今天就是听你们讲，畅所欲言。老蒯：我不敢，肖力（对蔡）：你大概也有意见？（蔡答：有），就讲嘛。（蔡：发言人太多，争不上），可以递条子嘛，（我写条子给了肖力）。肖力（对孙蓬一）：大炮，放嘛！（孙蓬一：我有些问题要讲，我想单独和你谈谈。）肖力：走吧。带孙走了。

会议继续发言……

伯达：还有半个小时，大家都不要讲了。

江青：蔡新平递了个条子给我，说和王大宾，谭厚兰意见不同，还有十分钟，请蔡新平谈谈。

我发言完后江青没有说什么，就说今天会就开到这里，明天再继续。第二次接见实际上一直等到了11号。11号的接见气氛和6号就大不一样了。这次会上，江青和各位与会的领导都频频插话，打断一些人的发言，江青还大发脾气，有一个同学（石油学院大庆公社的）发言谈到二月逆流的问题，大概是为某些“二流派”人物辩护，江青突然站起来说我看你就是二流派，吓得这个同学再也不敢吭声了。这次会议肖力开始也在场，我本想再和她聊聊，但她中途就离开了。

在这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肖力。

八、肖力在地院文革中的作用

肖力对地院文革的确有重要影响，她的支持和指点的确对地院“东方红”的取胜有重要帮助，但更多的是一种精神的鼓励，而不是参与“东方红”行动的策划，最多也就是在“东方红”行动已经酿成了大的事件后，在政策和策略方面做些指点，这种事后的指点与事前幕后的策划是有原则区别的。从“东方红”早期战斗队的发起串联，到成立东方红大队，进而发展到组建东方红公社，这一阶段她都没有现身介入，可以说我们的行动都是自发的。我们这些人能够聚集在一起，提出主张，发出宣言，制定章程，发起一个又一个的“造反”行动，主要是凭借大家思想的共鸣，而不是“上方”“高人”的直接指点指示。

策划一进地质部是叫形势逼的，而不是因为知道了《炮打司令部》。东方红

¹⁰ 《南方周末》2012-07-20，阎长贵、王广宇：《李讷在“文革”初期》

公社成立后实际上面临巨大压力，我们仍然是少数派，老保天天在学校搞斗“黑帮”（当权派），斗“反动学术权威”，抄家破“四旧”。他们搞得红红火火，完全掌握着运动的主动权。当时我们“东方红”也有人想和他们比着干，也想去抄家破“四旧”斗当权派斗权威，都叫我和朱成昭制止了。我说我们不干这些，我们就是一心批工作队，不把工作队的反动路线批倒，“反工作队就是反党”的帽子就永远压在我们头上，工作队不彻底向我们认错，检讨，交出黑材料，给我们彻底平反，我们就永远是“右派”学生。要批工作队不能空喊口号，贴再多大字报也没有用，必须把工作队领导，主要是队长邹家尤给弄回来，面对面地开展斗争。工作队不低头，老保的气焰就下不去。进军地质部，要邹家尤回地院接受批判，作检讨，打老保气焰，在当时成了我们的共识，也成了我们唯一可以采取的有效作战方针。我们一进地质部的决策就是在这个背景下产生的。这是一个运动发展的自然过程，与肖力来没来地院无关。

此外，朱成昭还有他自己更深的想法，在一进地质部前就对我们说过，一进地质部后就更进了一步。听他的那些想法，按现在的说法就是令脑洞大开，因此印象很深。他说：中央有三根线，边说边拿了三根筷子比划，一根是毛泽东为首的在中间立着，一根是刘少奇为首的，上左下右，一根是周恩来的，上右下左。工作队是刘少奇指示，周恩来派遣，刘少奇的路线是通过周恩来派出的各部委工作队来执行的，要揭开中央的盖子，就得通过攻打各部委的工作队，往上揪。他这个思想成了发动二进地质部行动的理论指导，已经不再局限于批工作队了，把造反派的行动意义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他这套思想现在看当然很肤浅，但在当时却让我们感到很有“深度”，眼光已远远超越了我们的单纯。这个思想显然不会是肖力给灌输的，在我们串联成立东方红战斗队时，在不同场合，他就曾不止一次地表达过类似的想法。别说那时还不认识肖力，就算认识，肖力那个时候是不是有这个想法，我也怀疑。到了三进地质部，朱成昭胃口就更大了，口气也就更大了，就有了野心。他要在地质部安装几百部电话（交换机），要指挥全国。在占领地质部后，主要领导办公室都被“东方红”的人占领，部长们的红电话也在他们控制之下。有人开玩笑说“你可以当地质部长了”，他说“颜宽就行”。颜宽是大学一年级学生，是朱成昭的老乡，也是“东方红”最早发起串联的人之一，他紧跟朱成昭，但因出生资本家，朱没有给他封什么官。他说颜宽就有资格当部长，可见部长地位已不在他眼里。他在接触叶向真之后，思想就开始“右倾”，由左向右急转，与中央文革的思想格格不入，已开始分道扬镳。伏庆是在回忆朱成昭“闭门思过”后也有一个关于“三条线”的说法，而且更为奇特，变得更具体更形象：

朱成昭在西三楼 327 房间“闭门思过”……在这段时间里，朱对我说了很多话，但并不系统，陆陆续续说的。他说他与戚本禹谈了 3、4 个小时，戚辩不过他，无法批驳他的观点，只能让他闭门思过。说叶帅与中央文革小组的人争论，拍桌子把手指都折断了。将来如果打起仗来，还是要靠老师，中央文革这帮文人能干什么。毛主席现在只是利用这帮文人，迟早要把他们抛出来当替罪羊。又说中央有 3 条线，一条是毛，下粗上细，因为长期的宣传，把共产党的一切功劳都归到毛一人身上，老百姓只知道“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不知道别的，所以越往下层，拥毛的就越多，其实毛在中央是少数；另一条线是刘少奇，上粗下细，跟毛相反；第三条线是周恩来，上下一般粗。还说造反夺权，国家部门瘫痪，国家经济已撑不住了。他对我说，如今要打倒一个人很容易，你随便说 3 句话，就可以把你打成反革命。我开玩笑说，我说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这 3 句话，你如何把我打成反革命？他说那可以说你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照样是反革命。

我认为这是他思想的新发展，和他早期的“三条线”理论相比方向也发生了变化。朱成昭和他的追随者们是真正的造反派，是有独立思考的“造反者”，他们的头脑并不是简单接受来自各方的“灌输”，虽然也在努力窥测领导意图，但更多的是在用自己脑子在思考，并不是上面怎么说就一定会怎么做。他从来都不会言听计从，更不是驯服工具，再加狂傲自负的倔强性格，在毛时代特定的政治环境下，是导致他们走上不归之路的内在因素。“神”让你按他的指点方向去造反，可你反过来却要造“神”的反，其下场可想而知。朱成昭对“神”经常出言不逊，一个最好的证明就是他后来与肖力的绝交。田春林回忆，当他劝朱成昭说，正是因为肖力的指点我们才取得一个接一个胜利，肖力是谁，肖力是主席的女儿。朱成昭勃然大怒，猛一下站起来，脸色通红，说：“田春林你以后在我面前少提肖力！”可见他根本不买肖力的账，也可以说肖力对他的影响有限。

毛泽东既有深谋远虑的战略思想，又有驾驭群众运动的高超手腕。他利用林彪的邪教式的鼓吹中央领导集体的认同，使自己高坐到了圣坛之上，使他的思想具有了对民众特别是青年学生的巨大控制作用，“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他用无比巨大的号召力把这帮学生鼓动起来造反，造成了天下大乱。在大乱的混沌之中，他在仔细观察，他要从中找到符合他的战略目标、可以为他所用的那股力量，按现今时髦的说法就是要找到“抓手”，树立起风向标，规划出模板，将运动推向 he 期望的方向。毛还有一个在运动中选拔接班人的想法，要在运动中寻找发现符合他思想，有培养价值的青年领袖。在这一点上毛和那些说“还是我们的子弟可靠”的领导人不同，毛泽东不太看得上八旗子弟。

根据王广宇的回忆，肖力其实是主席让她到中央文革来的，她有些活动连江青都不一定清楚。她那段时间主要在各个高校活动，就是在替主席收集高校运动情况。由于她的外表和普通大学生没什么区别，能够直接深入到学生中去获得第一手资料，是主席观察学生运动的重要帮手。地院在一进地质部之前她可能来过，但亮出自己是中央文革工作人员的这个身份，应当就是在8·23那天。那天是学生第一次向国家部级机关发起冲击，事件惊动了“上方”，肖力及时介入，她所了解到的情况符合了毛泽东的战略意图，为毛泽东找到了一个很有价值的“抓手”，从此地院“东方红”就成了可以被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利用的得力工具。为此肖力在很长一段时间都和地院“东方红”头头保持着频繁的联系。王广宇回忆，一次戚本禹告诉他赶快通知肖力回家，王广宇领会是主席找肖力了。当时没有便携式移动联络设备，要找肖力就只有根据她的活动规律来搜索，第一可能就是找朱成昭。而且果然在地质部找到朱成昭后就找到了肖力。由此可见肖力与地院“东方红”的关系，特别是与朱成昭的关系是很不一般的。当朱成昭在下面议论中央文革的不是，发出批评中央文革的系统言论的事被人报告给中央文革后，中央文革也就只是通过陈伯达发出警告。后来发展到公开发布对抗中央文革的“宣言”，以检查为名宣扬他反中央文革的八大观点，按说这态度是够恶劣的了。但中央文革也就只是让他“闭门思过”。再到后来朱成昭“叛逃”被抓回后，也还只是让学校限制他行动。宋翔雁老师的回忆录中有一段（宋翔雁回忆录的第二部分，未发表稿），说王大宾领他到解放军报社去见肖力，让他有机会亲自聆听肖力对朱成昭的看法，让宋翔雁了解肖力是真心想让朱成昭回头的，然后让宋老师到校革委会软禁朱成昭的地方去，做朱成昭的思想工作，希望“浪子回头”。看过这段回忆后，我深感肖力的用心良苦，对朱成昭是多么看重。如果朱成昭真像戚本禹说的那样“悬崖勒马”，我相信他肯定会“回头是岸”“立地成佛”，如果他能诚心投靠，一定还会被继续重用。要是换个人如此公然地反中央文革，早就被打成“反革命”送进监狱去了。在朱成昭反中央文革的前后，北京乃至全国反中央文革的事件此起彼伏，像朱成昭这样一而再再而三地被宽恕真是罕有。可惜他是一个不肯回头的死硬分子，肖力想救他也无可奈何了。最后终于在1967年11月被正式逮捕，这距他反中央文革的事情败露过去了十个多月。在毛泽东活着时，他始终再没能脱了囹圄。只到打倒“四人帮”，1978年释放，1981年才平反。

应当说通过肖力，在“五大领袖”产生之前，朱成昭就已为毛泽东所知。中央文革对他的器重实际也是传达了毛泽东对他的器重。他走红在“五大领袖”中除聂元梓外的四个“小将”之前，但这个“小将”太有主见，个性太强，太桀骜不顺，最后扎了他老人家的手，不得不放弃。朱成昭之后，毛泽东又百般呵护培养那“五大领袖”，还有那个也是造反起家的王洪文，但最终都成了毛泽东的伤

心泪，一个也扶不起来。毛泽东希望在大风大浪中选拔接班人的计划终于彻底破产。毛熬到最后选择了他认为最老实可靠、“你办事我放心”的接班人，结果“尸骨未寒”就违背了“圣意”。“圣意”把圣上自己也糊弄了。

【生逢乱世】

文革中在地院、上海和北京的几件事

庄一龙

《昨天》编者按：本篇摘录自作者正在撰写的长篇回忆录。原文后有当年《首都抗癌联络站工作简报》等附件略。

和旷伏兆的一段交往

我出去串联有 20 多天，10 月上旬回到学校，伏庆是说也要去串联，朱成昭就让我去顶替伏庆是担任总部办公室主任。这时期，有一件事印象比较深：有一天，地质部的几个副部长都被揪到地质学院，准备接受批斗。我在查看有关材料时，发现旷伏兆连批判材料都没有，怎么批斗？旷伏兆说他心脏不舒服，我当时有点同情他，就单独让他站到一边去，又让人给了他一只凳子。

后来我就请求把旷伏兆交由我来管理，我把他安排在我的 13 楼宿舍房间，让他在房间里写检查，并在大楼门口贴了个通告：鉴于旷伏兆有心脏病，经总部同意，勒令其在屋内“闭门思过，交代问题”。所以一直没有让他参加体罚性劳动（扫地、清洁厕所等）。每天我晚上回来，常常和他聊到深夜。

事实证明我的分析是对的，只过去了一个多星期，周恩来总理就打来电话，要让旷伏兆出来主持地质部的“抓革命、促生产”工作。旷伏兆临走时想同我见个面，但没有找到我，就在桌子上给我留下一封信：“庄一龙同志：总理来电话，让我去地质部抓革命、促生产，我们这段时间相互有了了解，谢谢你的帮助，以后我们还是会见面的。旷伏兆”。

果然，我和他以后不但还见了面，对我的人生还发生了重要的影响。

例如，1967 年 9 月，我搞抗癌联络站时，需要设立一个医疗点，没有房子，旷伏兆把当时空闲着不用的地质部政治干校的一栋楼房借给我（不过，后来我去看了一下，大部分窗子都被打烂了，没有要）。在我毕业分配到青海省地质队工作后，卫生部给青海省地质局发了一个盖有卫生部大印的调查公函，内容是通过庄一龙调查有关“516”分子的事情。虽然我根本都不知道“516”是怎么回事，

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是不容许你争辩的。就在我被追查“516”的问题时，正好地质部的“保矿兵团”骨干、原勘探局党委书记田实斋下放到青海省担任地质局党委书记，他把这公函扣下了。他派人把我找来，给我看了卫生部的公函，让我写一个情况说明，便把卫生部函顶了回去，使我避免了一次牢狱之灾。

后来我到了青海省地质十队工作，十队的党委书记魏砥卿也是原地质部政治处的处长，他知道我同旷伏兆的关系较好，即使旷伏兆后来去了江西省五七干校还给我来信。魏砥卿给旷伏兆写信时告知，庄一龙就在他的地质队里。旷伏兆回信让他好好关照。所以，在十队时，魏砥卿一直给我有所照顾。

但是，在一次次政治运动背景下，即使在地质队也是很危险的。在北京已经有人传说“庄一龙已经被逮捕”的流言。我向魏砥卿提出回上海老家休养，魏砥卿在党委会上通过了我回上海治病的要求。因此我才有了一段4年多的上海休养的时间。正是利用了这段时间，我研究出了“斥力子假说”理论，并且也是魏砥卿让地质队给我开的报考研究生的证明，使我考取了华东师范大学自然辩证法硕士研究生。以后，魏砥卿调任天津地质局党委书记时，还专门来华东师范大学看我。

关于上海联络站和《首都红卫兵》报（上海版）

我从广西等地串联回来后，朱成昭让我接替伏庆是的地质学院东方红办公室主任，可是只当了两个多月，王大宾就让我去管广播台，当时学校的人大部分都去串联了，学校里有点冷清。有一天，我在安排广播节目中，有一支电影歌曲《人说山西好风光》，想不到马上遭到大字报炮轰，说是有人在公然播放靡靡之音，广播台内部人员也有非议。我觉得广播台不是自己合适的工作，就提出要去上海发展的要求。

我是1966年12月初到上海的。当时首都三司上海联络站已经有了，总部设在愚园路311号，负责人是江涛，还有徐烁，彭善慈、包谷熙、朱德瑜等，311号总部那里实际上仅仅是个公开的对外联络点。

我去上海起初是想推广《首都红卫兵》报，但是发现模板运输、翻印，当时条件不能及时实现，就决定自己办一份《首都红卫兵》（上海版），我就去找解放日报社社长马达商量，要求利用解放日报社的力量出版这份报纸。马达不敢得罪北京红卫兵，乐得做个人情，同意在解放日报社出版《首都红卫兵》（上海版），对开版面，和《解放日报》同样大小。发行量是我同马达商量确定的，为5万份。起初组稿、编辑、排版、校对就我一个人，为了要在1967年元旦出版，我还在第一版亲自写了《元旦献辞》，还挑选了一张毛主席和林彪在一起研究问题的通

栏照片，套红出版。

报纸印刷出来后，马达电话通知我，报纸印了5万份，我说少了，要再增加5万份。马达说印刷已经完成，没有保留纸型，不能再增加印刷数量。于是《首都红卫兵》（上海版）报纸印刷数量以后一直保持5万份。

我来到解放日报社印刷工厂，一看见报纸大吃一惊，5万份报纸堆了满满一房间，要我马上运走。这完全是出乎我的预料，我原来以为报纸出来后，解放日报社就会把报纸发送到全市读者手里，现在这一切发行工作都要我自己去完成，真的没有准备。我只得把这批报纸先运到自己的住处。

其实首都三司上海联络站在上海掌握着很多处房子，都是一些当时被红卫兵抄家后赶走的前资本家的别墅。联络站的主要成员都有自己的住房，成员之间也相互不知道住宿地方。除了愚园路311号总部外，我所知道的还有建国西路英国亚细亚石油公司总经理的别墅，还有乌鲁木齐路19弄1号的别墅，愚园路490（586？）号工商银行2楼等。

我起初同江涛、朱德瑜等住在建国西路英国亚细亚石油公司总经理的别墅，这里很大，有个大草坪，仓库房间里堆放了许多外国名酒，后来被江涛喝了不少。当时陈丕显还亲自来过，给了一辆吉普车和一些自行车作为交通工具。派来送车的人匆匆在车上讲了一下开车要领就走了，几个人就上了车，由徐炼驾驶车，在花园大草坪转了几圈，就上街了。胆子真够大。后来，我为了搞一个红卫兵通讯社的需要，搬到了愚园路490号，那里原来是上海戏剧界红旗造反团的总部，他们撤走后，就由红卫兵通讯社接收下来了。当时还有地质学院的宏良（邬孝梁）和几个上海的中学生（王念申等）。

我让王念申发动一批上海的中学生去上街卖报纸，每人每天发5毛钱补贴，中学生热情很高，每人都抱着一大捆报纸出去了。我为了想了解市民反映，特地到南京路看看，当车经过国际饭店时，看见买《首都红卫兵》（上海版）报纸的队伍从国际饭店排到了大光明电影院。我真是得意极了。回来后，各方面一清点，当天共销售了5000多份报纸。虽然成绩不错，但是对于5万份总数来说，这差得太远了。

为了解决发行问题，我去找邮电总部，请邮局帮助发行《首都红卫兵》（上海版）报纸，答应给邮局25%的分成。从第二期开始，报纸发行便交给了邮局。只要报纸一旦印刷完成，我就电话通知邮局，邮局的专车便把报纸拉走，第二天，《首都红卫兵》（上海版）就会出现在全市数百个零售点上。

从第三期以后，《首都红卫兵》（上海版）报纸的编辑工作就交由朱德瑜、潘人龙等负责，由他们二人长驻解放日报社。

《首都红卫兵》（上海版）报纸由解放日报社出版、印刷，发行是由邮局负

责的，我在每次报纸印刷出来后通知邮局。本来以为报纸交给邮局后，报纸出版任务就完成了。可是有一天，解放日报社财务找我要计算费用，我这才知道还有费用问题存在。我马上同邮局发行科联系，邮局说发行报纸的钱都在邮局，等我去结算。

《首都红卫兵》（上海版）报自己根本没有账户，为了要设立账户，我就到黄浦区人民银行申请了一个“首都红卫兵通讯社”账户，让邮局发行科以后就把结算后的钱都打到这账户上。我从邮局发行科提了两次钱给“首都红卫兵通讯社”账户，第一次是 5883.30 元，第二次 2296.20 元，共 8179.50 元。奇怪的是后来文汇报社也来向我要钱，可是，《首都红卫兵》（上海版）根本同文汇报社没有关系呀，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一度也没有搞清楚。以后才领悟到，大概是其它北京来沪的红卫兵组织在文汇报社也印了一些小报和宣传品，在邮局发行科累计了一部分没有账户的钱，现在既然有了一个“首都红卫兵通讯社”账户，因此邮局发行科就把这些钱都转到“首都红卫兵通讯社”账户上来了。而我本人当时并不清楚自己这一家在邮局发行科应该有多少钱，反正只要邮局发行科转过来的钱，我都照收。

但是，我从来不用这个账户里的钱。原来设想以后在上海发展事业时用，可是形势急转，中央要求学生一律回学校“复课闹革命”，我必须妥善处理掉这些钱。一直到离开上海前，把这个账户里的钱分别送还了解放日报社和文汇报社。等于给每家报社发了个红包。所以后来两家报社再没有来找过麻烦。

附当年二张：

收条一

今收到庄一龙交来的：

现钞叁百拾肆元整

存折壹千元整

转交解放日报社款回单一张，回单总额：

肆千叁百捌拾叁元叁角整

封存零钱陆元肆角柒分整

经手：鲁雷 潘人龙 （签字）

收条二

67 年 2 月中曾收到北京地质学院庄一龙同志交来银行转账发票两张，其中一张转文汇报社 1000 元，另张转上海解放日报社 1296.20 元。后此两张单据由我转给潘人龙（北地）同志负责处理。 特此

证明

北京工业大学革委会 6222 班战士

周祖通 （签字）

67 年 10 月 31 日

1966 年 12 月底，我参加过一次在静安寺百乐门淮剧场由张春桥、姚文元召集的上海一些重要造反派负责人会议，我和江涛、朱德瑜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内容是分析形势和布置任务。

“一月革命”期间，上海各派斗得很厉害，当时，上海警备司令部政治处一位军人拿着司令部的介绍信找到三司上海联络站，告诉我，根据毛主席“军队要支持革命左派”指示精神，如果你们活动需要军队的帮助，可以同他联系，并且把他的联系电话告诉了我。这虽然给北京来的红卫兵以后行动壮了胆，但是，一直到我离开上海，都没有联系过军队。

“一月革命”后，紧接着筹备在人民广场召开一个 10 万人的大会，我参加了几次在上海社科院由朱永嘉等召开的筹备会，并写好了大会发言稿，可是到了开会那天，从社科院去人民广场的大会主席团代表的汽车就要开动前，江涛匆匆赶来找到我，说是要看一下发言稿，我把发言稿给了他，他很快看了一下，就说，这个发言由他去。大会筹备组一下惊了，主席团代表突然换人，不知道三司内部出了什么事情。朱永嘉打圆场：“你们自己商量一下，谁去都可以。”我很生气地离开了。

阿尔巴尼亚国防部长巴卢库来上海，我和朱德瑜、江涛随上海市对外友好协会到机场迎接，我为《解放日报》写了一篇社论《欢迎来自“山鹰之国”的朋友》。

后来在 1967 年 7 月发生了一件事情：一天晚上，朱成昭来上海，在广东路地质部招待所要见我，他知道我办报纸掌握有一部分钱，他说最近想去广东考察调查一下，想探索一条“南斯拉夫的道路”，问我是否可以借一些钱给他。我问他要多少？他说最好多一些。我答应给他 2000 元，约好第二天晚上送来。可是第二天下午，就有人电话告诉我，朱成昭已经回北京了。以后才知道，是公安部副部长于桑把朱成昭带回北京去的。朱成昭没有来得及从我手里拿到钱。

为“抗癌骗案”调查翻案和首都抗癌联络站

首都抗癌联络站是地质学院东方红插手卫生部系统文革运动的产物。

还在我担任东方红总部办公室主任时，曾经接待过一个地质部航测大队的医生纽韵雯（其丈夫许端是章士钊义子），知道存在一个跨越地质部、卫生部、军

队总参、301 医院，涉及多名高级干部的“抗癌骗案”。当时由于其它事情忙，一直没有处理。过了几个月后，我从上海回来，由于地质学院东方红内部派系斗争，正在反“托派”（也就是蔡派），把我和“托派”联系在一起，我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了。

一天，邹韵雯带着医学院的两位学生又来找我，要我出来帮助他们调查“抗癌骗案”。我让他们去找田春林和李贵，田春林和李贵同意参加“抗癌骗案”调查，由我代表地质学院参加。于是我组织了物探系几个学生一起参加。

地质东方红在当时是红卫兵三司领袖，我联络了北京的中国医科大学、北京医学院、北京第二医学院、铁道医学院、中医学院、北京师范学院、中国科技大学等高校，和反帝（协和）医院、日坛（肿瘤）医院、工农兵（同仁）医院、反修（友谊）医院等几个大医院，还有卫生部、铁路总医院、解放军总医院的地派力量成立了一个“首都抗癌联络站”，总部设在地质部西五楼，开始了对“抗癌骗案”的全面调查。

地质东方红在“首都抗癌联络站”里起着组织，策划，行动实施的主要作用，我是“首都抗癌联络站”的负责人，骨干成员有赵宜（二医）、刘淑珍、宋乃光（中医）、董宝玮、端木奇（医科大）、何欣培、张延铭（铁医）、洪朝宗、赵文翰（师院），还有后来商业部一个支持民间方法治疗肿瘤的王继武局长也加入联络站，在商业部大楼里成立了“首都抗癌联络站第一分站”，负责人是罗冬苏。由于王继武在长期革命斗争历史中，以公开身份担保过四、五十个革命干部，文革时期，这些人已经成为全国各地的高级干部，如许世友（南京）、南萍（浙江）、王建安（济南）、王少庸（上海）、王效禹（山东），这为联络站开展工作带来了很多方便。

在调查案件涉及的政治背景的同时，在对“抗癌片”疗效调查过程中，发现了许多民间存在的“抗癌防癌”的好方法、好苗子。当时李富春副总理知道后，很高兴。在有关“抗癌骗案”的报告上批示：“可以调查，可以翻案，把翻案的方案报告给总理。”

以后，我们开始扩大调查范围，除了“抗癌片”疗效调查，还对各种民间的抗癌医疗成果进行挖掘，在北京部分大医院对“抗癌片”和其它中医疗效观察试验。并且建立了“家庭病床”医疗制度，采用医生通信治疗和邮寄药物，成立了由病人组成的病人委员会，负责协助管理在家治疗的患者，解决了床位不够的矛盾。

后来，首都抗癌联络站在洛阳、安阳、营口、天津、青岛设立分站，以后首都抗癌联络站发展成为首都抗癌协会。首都抗癌联络站原来的组成单位就成为协会成员单位，我是协会的第一任负责人。

那一段时期我和不少重要人物有交往，请求得到他们支持。除了旷伏兆，还有王昇晔，王季范、徐特立、徐运北、章士钊等。通过调查发现，在我国的中医药宝库中，有大量的抗肿瘤的民间成果，它们急等待挖掘。当时比较典型的地方有：河南洛阳的郭琦中医大夫、成都的刘福远中医大夫、北京的徐兴立中医大夫，王审耕中医大夫，天津东风医院孙秉严大夫的血液癌毒分析等。

为了解河南地区食道癌的高发原因，在河南省委耿起昌和卫生厅高任平厅长的支持下，联络站纽韵雯等人对林县等山区农村进行癌症的发病率与矿藏、水文资料的研究，发现河南地区食道癌的高发同太行山的放射性矿产分布有关，提出加强疾病地理的研究，并且制作成了有关图件，通过总理联络员王文政转交总理。

首都抗癌联络站的工作一直得到总理办公室的不断关心。总理联络员王文政、王成智经常同联络站保持着联系。周总理在癌症晚期的时候，他还曾经指着桌子上的肿瘤发病分布图对卫生部的同志说：“不进行调查，哪里会知道这些情况。”

通过调查，基本搞清楚了所谓“抗癌骗案”的来龙去脉：此案的起因，是由鞍山铁东医院的医生杨雨田自己研究出一种有显着疗效的新药物，并且已经有2000多的成功病例，在社会上有了相当影响。纽韵雯最初是航测队医务室一个医生，也是肿瘤患者，使用抗癌片后肿瘤消失，于是就帮助医生杨雨田宣传和推广抗癌片。而当时的301医院副院长李奕肯定杨雨田和纽韵雯的革命行为，并支持推广抗癌片。但是在当时卫生部专家看来，“抗癌片”能够治好肿瘤是不可能的，这是一场骗局，李奕的支持“抗癌片”又把支持李奕的肖华和罗瑞卿之间的军队内部的斗争牵涉进来了，于是在卫生部、总参和地质部的反对势力联合下，利用“抗癌片”的疗效问题，把李奕、杨雨田、纽韵雯三人打成一个宣扬“抗癌片”疗效的诈骗集团，并且通报全国。这是一个错案。当年抗癌联络站的一份简报中说：“这期间，钮韵雯在地院东方红总部王大宾、李阴增等同志的帮助下一一直在同卫生部一小撮走资派进行斗争，到处告状，到处宣传、揭露，十二月又串联了上海中医学院来京的红卫兵，打进卫生部，抢出了有关‘抗癌骗案’的黑档案材料。为‘骗案’进一步翻案找到了大量材料。”“在铁的人证、物证面前，终于在3月21日出文撤销了‘黑通报’。并向受黑通报迫害打击的同志公开赔礼道歉，恢复名誉。”

在新华社国内文革报道部的帮助下，《内部参考》上发表了抗癌片及联络站工作的消息，此消息是同氢弹爆炸同时作为国内科技动态发表的。

随着形势的发展，首都抗癌联络站在后期改名为首都抗癌协会，结束了“抗癌骗案”的调查，重点转移到抗癌工作，由卫生部有关部门进行人员调整监管。

【忆旧思亲】

怀念几位“东方红”难友

何建勋

《昨天》编者按：本篇摘录自作者的长篇回忆录《尘封的岁月》。

在这里我想追忆几位东方红公社的老难友、老校友。

“婉约词人”黄瑞华

黄瑞华是湖南人，性格内向，由于我俩都比较喜爱文学，所以交情甚笃。黄瑞华喜欢填词，感情细腻缠绵，当属婉约派。他也有少量作品有豪放派的风格。例如东方红公社一轰地质部，上千师生到地质部静坐示威时，黄瑞华激情难抑，口占一组绝句。其中第一首是这样的：

日月星辰随意改，黄河万顷石门开。
此身合是忘家客，曾自枪林闯阵来。

我曾问他石门在何处？他回答说，他湖南家乡有个地方叫石门，不过这里的石门是虚指。

朱成昭“闭门思过”，黄瑞华对陈伯达批来的条子措词之严厉甚为不解，认为把东方红一棍子打死了。黄瑞华忧愤写道：

无知幼稚何须计，几寸真诚几寸心。
倘使惺惺能识吾，人间正道是常情。

后来院军代表又把他收进朱成昭集团骨干分子学习班，他的情绪更加悲观低沉。有一次，那个来自空军的长得像吴法宪似的军代表训斥田春林：“反北京市革委会的丁国钰，就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田春林争辩说是“小将犯错误”。军代表要大家开会批判，黄瑞华执意不发言。他写《忆江南·西山碧云寺》：

苍松老，花草正匆匆。几代纷荣豪杰气，如今剩却玉堂空。点点笑英雄。

他又写《观香山红叶》：

远看香山红遍遍，近观满树血淋淋。
抒情何在寒风起，万里红涛是我心。

朱成昭集团骨干分子学习班临解散时，黄瑞华对未来前途空前绝望，尤其是杨雨忠的跳楼，对他触动很大。他写《水调歌头·读红楼梦》：

月满琼窗下，风洒竹丛间。红炉冉冉熏药，秋水玉台前。银汉迢迢何意，南国家乡万里，无语动心弦。起伏万千绪，只是一情绵。薄命子，空周折，却无缘。芳魂涕血，灵水难系百花仙。真假那堪寻觅，漫把长歌当泣，渺渺水连天。恩怨既相投，何要命相连？

他这首词有所指。他身体不好，常用电炉熬药，这便是“红炉冉冉熏药”。他要跟女朋友掰了，不想连累人家，所以有“望断秋水，芳魂涕血，何要命相连”。他叹息东方红公社的命运，犹如“薄命子，空周折，却无缘”。从这首词，我深感他动了诀别人世的念头。他果然短命。今天，我唯有用他的词句来缅怀祭奠他：“小铃闲会阁船头，为我奏、竹萱新句。”

并不“滑头”的滑正本

我们都叫他“滑头”，其实他做人一点也不滑头。

“滑头”是河南人，我的老家在河南，应该说我俩是老乡。朱成昭落难后，我们这帮“啃猪蹄儿”的日子也不好过，“滑头”还跟着我到武汉，在我家住了一段时间。他和我大哥、四弟都很谈得来。他给我的印象是待人热情、彬彬有礼，且有透骨的政治敏锐。

记得在那个特殊的政治年代，由刘春华所作的一幅油画《毛主席去安源》曾经一度在中国家喻户晓，印刷量高达9亿张之多。这张油画很受中央文革重视与推崇，用来作为打击刘少奇的重要利器。因为当时连小学语文课文都曾记载过安源煤矿工人罢工是刘少奇去领导发动的。

“滑头”偏偏从油画中发现存在重大政治问题：这张画的背景是乌云密布的天空，左上角透出一束阳光蓝天，毛主席身后则是层峦叠嶂的苍茫关山。这不是暗合毛主席诗词名句“雨后复斜阳，关山阵阵苍”的寓意吗？再看主体画面，是年轻的毛泽东身着长衫，手里还夹着把红色油纸雨伞——这不是向观众明显暗示

毛主席是“雨后送伞”，想掠他人之功吗？作者为了更加突出这一主题，还在画面上年轻的毛泽东脚下点缀几片红叶——谁都知道，红叶象征着革命先烈——毛主席踏着革命先烈的鲜血和遗体，到安源“摘桃子”来了。这真是反动透顶！

我们反复端详那张油画，越看越觉得确实有问题，不由一声惊呼，立马准备站出来揭发这个居心叵测的现行反革命罪行。“滑头”摇摇头，笑我太幼稚了。说人家刘春华正当红，红得发紫，炙手可热。中央文革需要用他这根金棍子打人。你跳出来横插一杠子，岂不是扫了中央文革的兴？连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这些明摆着的大叛徒，毛主席都视而不见，何况一个小小的刘春华？利用就是政治，如同中央文革利用地质东方红一样。以后用不上了，自然一脚踢开。

还有一次，军代表办朱成昭集团骨干分子学习班，临解散时我对“滑头”说，中央文革至今没怎么动我们，是不是手下留情，准备放咱们一马？“滑头”凄然一笑说：“想得倒美！《十六条》中虽说是凡是学生问题，一律不整。这是话里有话。现在不整不等于说将来不整；学生不整——等将来你不是学生的时候再整。还怕你个孙猴子能跳出如来佛的手心不成！什么时候你不是学生？把你往底下地质队一分你不就变成工人了？到时候怕整不死你！反正你的问题往档案袋子里一装，那就让你背一辈子，一辈子都别想翻身。压死你！”

“滑头”就是这样不堪重压，逃回河南也逃不过重重打击迫害，他终于选择了杨雨忠的道路：跳楼！他从此获得了精神枷锁的解脱。

“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滑头”，我好留恋我们一起躲在宿舍里，用脸盆架在电炉上清水煮鱼的美好时光！那一顿最后的晚餐，至今让我难以忘怀！干杯，“滑头”大哥！

郑文卿与胡乐成

郑文卿与胡乐成这两位老兄，在我印象里好像是形影不离，“焦不离孟，孟不离焦。”郑文卿的绰号叫什么？记不起来了。胡乐成的绰号叫“狐狸”。这个“狐狸”并不狡猾。他有张飞之粗无张飞之细。虽说是长得一脸横肉、满身匪气，却也并不可怕，倒是有几分可爱可敬。比较起“狐狸”来，郑文卿要斯文多了。他是南方人（好像是福建的？），个不高，一脸络腮胡子，老显出一副深谋远虑的样子。他俩在地质东方红里以特别能打仗著称，胡乐成曾经当过作战部长和到四川揪彭德怀的钦差大臣。

我与这两位老兄结成患难之交，真有一番患难与共的经历。记得东方红造反队成立不久，我只身高举一张“工作队是三类队”的大字报驱赶工作队，与学院对立面“斗批改”一方发生激烈冲突，立刻陷入重围，双方都有肢体接触。此时，

胡乐成与郑文卿杀了进来，像拎小鸡一样，一边一个，架着我冲出重围，躲进了东方红司令部大楼。“狐狸”冲着我直嚷：“你小子不要命了！”

朱成昭“闭门思过”后，我与二位兄长自然而然抱成一团，成了“啃猪蹄儿”的死党。

如今，郑文卿下落不明，“狐狸”自1970年被扣押留校继续接受审查时就被逼疯了。一疯就是四十余年。他也是因祸得福，没有受到更深的迫害。好在今天的中国地质大学（原北京地质学院）的领导人校长张锦高、书记李玉和很讲老同学的交情，把“狐狸”包养了下来。

好想去看望“狐狸”大哥，一直没有勇气——怕我们难兄难弟的感情上都承受不了！

【故纸堆】

北京地院革委会整“高安反革命小集团”的 一份大事记

徐小青 录入

《昨天》编者按：这是一份不可多得的历史资料，从编号看，估计当时印数有限，保存下来的应该更少。其中记录的内容，不管是当事人的交代，还是有关人士的“情报”，难免会有断章取义的文字，捕风捉影的信息，但至少所提到的一些时间、地点、人物及相关背景，还有当时那些大字报或文章的标题、标语口号及行文用语等等，都可以给回忆和研究那段历史的人们提供参考。

严禁外传

定期收回

我院高元贵——安静中反革命小集团 及其御用工具黑二团校内活动部分记事（初稿）

1967.6月——1968.3.

编号：0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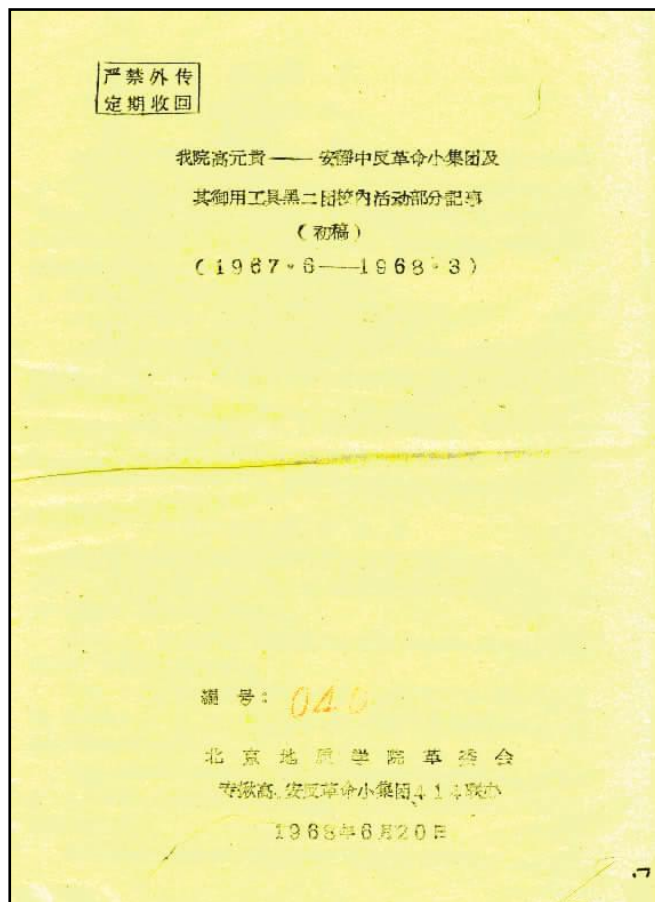
北京地质学院革委会专揪高、安反革命小集团414联办

1968年6月20日

最高指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前言

这份材料仅根据高元贵、郑雪禾等知情人的揭发、交代材料，和《二团》们



部分大字报中摘录汇编而成的，不是一份完整的大事记，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我院“二流”派在校内活动的情况，此材料需要随着阶级斗争向纵深发展，不断地加以核实，补充和修改。希望有关工作的同志共同完成这项工作。

我们编这份材料的目的是：

1. 为了揭露我院“二月逆流”的反动面目。

2. 为了给有关同志提供考虑问题的线索和思路。

由于时间的仓促，在取材、编写等方面，都可能存在许多缺点和错误，希望同志们批评改正。

我们希望通过同志们的工作，将来能够在这个问题上，不断补充新材料，加入革命师生员工为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而战的史事，编写出我院一场惊心动魄的夺权与反夺权，复辟与反复辟的两条路线斗争史来。

.....

北京地质学院革委会专揪高安反革命小集团 414 联办
一九六八年六月二十日

一九六七年六月份内容提要

在院革委会的领导下，全院开展了第二次整风，掀起批朱高潮。但我院“二月逆流派”，以为时机已到，借批朱和整风的机会，打着“反朱”的旗号，把矛头指向革委会。

筹建“七一整风串联会”企图把它成为常设的机构。阴谋拉队伍，搞分裂，和革委会分庭抗礼。

“七一串联会”是谁发起的？是学生？还是干部？铁一般的事实说明，最先是由高、安、吕、郑之流策划的，只不过通过学生的口，由学生出面组织起来的而已。

“七一串联会”的纲领，就是把要求批朱的群众组织起来，走清华 414 的道路，分裂革委会。他们歪曲“七评”中有关分裂主义的论述，作为理论根据。

但是，这些右倾机会主义者搞分裂的真面目，被那些在“七一串联会”上扬言要把东方红被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的人无遗的暴露了出来。

△1967 年 6 月某日

△殷维侯到八.八战斗队找高元贵，通知他晚上到安静中家座谈。

座谈会在东三楼 216 莫宣学家召开。有高元贵、安静中、莫宣学、毕先梅、殷维侯等人参加。进行了很投机的交谈，并分别亮明了观点。

高元贵说：安静中造反最早，为什么不能进入革委会？而黄振群在反干扰期间，出了很大力，为什么能进入革委会？

安静中说了以下内容：

1. 打击王焕。他说：“何长工早就想撤高元贵的职，王焕是何长工在地质学院安下的钉子。”

2. 污蔑打击李贵、王大宾。他说：“李贵是同意陶世龙的 6.20 革命委员会”“王大宾是摇摆不定，玩弄两面手法。”

3. 安问高是否认识聂元梓，想通过聂元梓与中央文革取得联系。

4. 安说：“成立革命委员会时，受了戚本禹的骗，没有拉队伍。现在要等待战机，抓什么战机，现在还不敢说。”

从高、安这次谈话中不难看出，早在 66 年（录入者注：应为“67 年”）6 月，高、安通过《二团》勾结成了反革命集团。攻击革委会主要成员，搞分裂、拉队伍的思想是由来已久的。

△ 1967 年 6 月 29 日

△下午在教一楼岩石教研室，郑伯让、刘肇昌出面召开地质系部分教师、干部会。有郑伯让、刘肇昌、邓晋福、刘文华、阮天健，万天丰、吴瑞棠、梁定益、林秀伦等人参加。会议要求把几个战斗队串联起来，发起一个公开的“形势串联

会”。

会上，郑伯让用“七评”中有关分裂主义的论述，作为理论依据，说明召开“形势串联会”不是搞分裂（按：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有人提出次日（6.30）即可公开召开，但刘肇昌说：“选择‘七一’开更好。可以打出《七一整风串联会》的旗号，和清华414一样。”还说：“清华有个414，我们为什么不能有个《七一整风串联会》。”

△晚上，在物探楼二层一个教室里，由于众主持会议，讨论有关“二团”贴了朱成昭的材料所引起的争论问题。有蔡新平、梁定益、邓晋福、邓雪禾、探工分会誓死卫东、赤二支、呐喊、暴动等二十多人参加。

蔡新平坚持要到外面去刷大标语和公布有关朱成昭材料的大字报。他说：“到时大家注意看，可能寿命不长”（按：中央文革有指示不让公布，革委会坚决执行，而“二团”们却公开对抗中央，但又心虚的怕大字报公布后寿命不长）。

1967年6月30日

△晚上，在全院召开揭发朱成昭大会之后，陈学敏、江祖如、梁定益、邓晋福、郑雪禾、余九乡、于众、蔡新平、赤二支、誓死卫东、呐喊等二十多人在物探楼二层一个教室开会。讨论朱成昭的性质问题和应采取的态度。

郑雪禾说：“办法有二：一是把调子提高，看总部的态度。打在朱成昭身上，疼在他们的心上。另一个办法是：看看。让群众对现状不满，再激发群众起来斗争。”江祖如说：“只有采取第一种办法。”

会上，同意了余九乡的建议：成立《七一整风串联会》，并确定由赤二支、研究生造反队、誓死卫东、暴动、红岩、湘江等十个战斗队作为发起单位。推陈学敏出面组织，马上起草《七一整风串联会》的通告和公告。

会议“公告”，后来由地质部一兵团打印并散发。

一九六七年七月内容提要

在光辉的伟大的“七一”日子里，高、安、郑之流打出了“七一”串联会的分裂旗号。这是对“七一”的极大污辱。简直玷污了“七一”这个光辉的节日。

在整个七月份，“二流”派们又干了些什么呢？

在高元贵黑手操纵下。他们一次又一次地打着炮轰革命委员会的旗号，恶毒地攻击革命委员会，制造保朱有功、反朱有罪的谬论，蒙蔽和欺骗群众。

地质系旧总支的一些干部突然地也活跃起来了，高元贵和安静中同“二团”的接触也频繁起来了，扬言要为安、周、蔡平反；“二流”派的头面人物高、安之流都公开登台表演，叫嚷“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宣称“反对革委会，捕捉

战机，现在看是没有条件”。而高安的小喽啰蔡新平、肖体修也大造舆论，说什么“地院当前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指革委会）的矛盾”“革委会这个政权已经臭了，应该进行第二次革命”，真是反动透顶，猖狂已极！

“二流”派为了取得外援，积极支持地质部一兵团，想通过高元贵和聂元梓挂上勾，搜罗了一批院革委会的校外反对派，疯狂不可一世。

自谢副总理指示“不要再搞什么串联会”之后，“二流”派们虽然旗号不打，但贼心不死，阴魂不散，仍想伺机再起。

△ 1967年7月1日

△上午教四楼101室，召开《七一整风串联会》。

△高元贵在《七一整风串联会》上讲话，谈了整风的几个有力条件，并表示同意彻底整风。

△晚上，《七一整风串联会》召开讨论发表“公报”的会议。

高元贵参加并发表意见：

- ① 口号不能提的过高。以免脱离群众。
- ② 对广播台不能说成与邹家尤的工作队一样，说是白色恐怖。

△ 1967年7月3日

△在教二楼召开《七一整风串联会》骨干分子会议。

有高元贵、安静中、郑伯让、王暄堂、江祖如、郑雪禾、万天丰、陈学敏、吉让寿、蔡新平、周永璋，殷维侯、孙司权等人。

会议主要内容是统一思想，研究今后怎么干？

蔡新平说：地院当前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矛盾（指革委会）。

高元贵提出：在批朱问题上，要搞合法斗争。

会议还通过了支持地质部一兵团的声明；宣读了革委会向中央汇报整风情况的一份简报。在这文件中提出了“批朱防蔡”的口号。

△ 1967年7月上旬

△一天晚上，在教二楼301召开串联会，有三十多个战斗队签到。会上，主要是江祖如发言，对“二团”作了一个全面的介绍。目的是要大家对“二团”有个正确的看法。消除对“二团”的戒心。散会时，按战斗队发给由“二团”整理的有关朱成昭的材料。

△郑伯让背着地质分会，在纪群家召开地质系原党员干部会。有纪群、任端芳、关侠、郑伯让、刘肇昌、叶俊林、刘文华、郭铁英、张本仁等人参加。主要讨论对革委会的估计和整风的问题。

郑伯让说：“整风能否整好，主要靠发动群众。系里辅导员都不愿意做工作，

你们要回去做党员工作，要大家动起来。”

叶俊林说：“有些造反派头头私心杂念比咱们重。”

郑伯让还说：“要看到这场斗争是长期激烈的。可能以后整党上会暴露出来。我们要多做工作。”

△高元贵到安静中家（东三楼 214 室）谈了以下内容：

① 安静中谈了他要高元贵帮助接聂元梓关系的用意：一是了解中央文革对聂元梓到底是什么态度，二是与肖力接上关系。蔡新平和肖力的联系断了，听说肖力常到新北大去。高元贵劝安不要和北大联系，因为我院群众对北大有很大气愤。如与聂元梓联系，在地院即将脱离群众。

② 安静中说，不拉队伍是受了戚本禹的骗。（据高元贵交代，安静中去年十月份还说过：单独拉队伍，在去年十月（1966 年）或今年二月整风时是可以实现的”。）

③ 安静中还说：“反对革委会，要捕捉战机，现在看不是没有条件。”

（按：高、安的这次谈话，充分地暴露出颠覆革委会，拉队伍、搞分裂的丑恶嘴脸。）

△七月十天左右，陈学敏要起草《告全院东方红革命战士书》，到高元贵宿舍（学 12—104）征求意见。

△ 1967 年 7 月中旬

△安静中在马路对高元贵说：他要给革委会李贵、王大宾一封公开信。

△在教二楼 801 开会。主要是各系学生，教员有梁定益、邓晋福、毕先梅、冯文珍、郑雪禾等参加。陈学敏提出召开全院《七一整风串联会》炮轰革命委员会。经过讨论，决定召开会议。

讨论过程中，郑雪禾认为：二月整风反朱，结果受压，这次炮轰解决不了问题。梁定益批评郑雪禾，说她的意见是消极的。毕先梅说：过去是我们没有组织起来，现在组织起来就好办了。

△在大饭厅前，召开了第一次炮轰革命委员会的《七一整风串联会》。

会上莫宣学、毕先梅、王暄堂、15632《风雷激》发言，主要论点是：在对敌斗争方面是包庇朱成昭，在干部使用方面，执行了“任人唯亲”的政策。

地质系旧总支、系办干部在东三楼王葆瑜家开会。请高元贵谈文化大革命的形势，会议由毕先梅主持，有任端芳、关侠、纪群、王葆瑜、王觉生、池际尚、杨光荣、陈安民、邓兆仑等几个辅导员参加。

高说：“在批朱过程中，势必要对地院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检查一番，历史问题清楚了，自然而然要涉及权的问题，探工分会把朱成昭分子给撤了，你们地质系要撤朱成昭分子是很容易的。”

△ 1967年7月18日

△在大饭厅里。召开第二次炮轰革命委员会的《七一整风串联会》，高元贵、安静中都亮了相。

会上，安静中念了他给李贵、王大宾同志的一封公开信。王大来讲了话。高元贵也亮了相。

高元贵说：“要翻一翻东方红的历史，要为过去受朱成昭打击和压制的人平反（即为安静中、周永璋、蔡新平平反）。”煽动地说，现在是“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晚上，在教二楼310，召开形势串联会。

陈学敏主持会议，主要是“二团”成员和地质系的教师、干部参加。有高元贵、安静中、王暄堂、郑伯让、叶德隆、吴瑞棠、梁定益、莫宣学、周永璋、郑雪禾、蔡新平、殷维侯、肖体修等二十多人。

主要研究：对总部《关于地质部形势的声明》和第二天六个分会及东方红广播台联合召开的“掀起革命大批判高潮誓师大会”持什么态度的问题。

高元贵建议：争取在第二天会上发言。次日，“二团”方面强行冲上讲台，抢坏了话筒。

蔡新平提出“现在对我院这个政权（指革委会）怎么看”的问题，让大家讨论。

肖体修说：“我看这个政权已经臭了，应该进行二次革命。”

△ 1967年7月下旬

△在7.18高元贵在串联会上公开表态和7.20《新东方红公社成立宣言》出笼之后，高元贵带着书面意见到安静中家，谈他对当前校内形势的看法，王暄堂、周永璋也在场。

高说：“主要锋芒，应该对准朱成昭《新东方红公社》集团。把八八战斗队与红色尖兵作为争取团结的对象，对朱成昭在革委会里的代理人，点名过多，宋云是工人，是听别人指挥的，不应点宋云的名。”还说：“革委会已出公告，准备结合王焕，你、我两人进入革委会，要同心合力……”

后来因为旧市团委有人来找安静中，搜集旧市团委的材料，高就离开了安家。

△一天，曹添在高元贵屋谈到夜里十点钟，走时见到安静中、江祖如、殷维侯、周永璋、吉让寿到高元贵屋。高元贵对曹添说：“周永璋、蔡新平我不太熟，找我最多的是吉让寿，他是二团决策人”。

△高元贵在串联会上公开亮相后不久，高元贵和郑伯让坐在学九楼路边交谈，高元贵说：“我在七一串联会上讲话后，估计可能受围攻，也可能推迟半年进入革委会。”郑伯让说：“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于1964年11月在高教部开会

反对高教 60 条的发言，已经抄来，存在岩石教研室。”

△在我院召开批判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真大会的那天晚上，高元贵和万天丰谈了半个多小时，万天丰说：“我认为你进入革委会，不如不进入革委会好。”

高元贵说：“进入不进入，各有利弊，进入革委会，同学们起码不能随便揪斗我。”

（按：从此看出，高元贵进入革委会的目的之一，是为了取得合法地位，从事反革命活动。）万天丰说：“你不进入，他们也不能随便揪斗你，斗争了你，看他们怎样向上级交待。”

△7.28. 11622《永向前》一篇“关于我院干部问题的严正声明”中，高喊高元贵、安静中应进入革委会，攻击王焕同志是见风使舵的人。

一九六七年八月内容提要

“二流派”们猖狂反对院革委会的言行，被小爬虫关锋、林杰之流看上了，直接支持了他们。下达黑指示，企图利用朱成昭的问题，达到颠覆我院革委会的目的。

为了迎合形势的需要，成立了《七一串联会》的变种《大批判联络站》，其活动更加猖獗露骨。这个组织受到了社会上“二月逆流”派的公开支持。清华反革命组织《红教工》也派来了联络员，并成立了“杀朱兵团”（实际上是颠覆地院革委会兵团），红旗杂志社赵易亚式人物周英、李惠让多次接见，并提出要革委会成员的情况介绍，为《大批站》出了不少鬼点子、坏主意。高元贵、安静中更是洋洋得意，出谋划策。为了组织上的统一和斗争的需要，高元贵建议安静中亲自出马，想法进入大批站。叫王暄堂把机关干部组织起来，叫王大来把探工系、水文系组织起来，结成第三势力。在高、安、郑精心策划和积极活动下，各系相应的组织相继成立，建立了宣传组、外联组、大字报编委会等，真是万事具备。可有大干一场之势。

十五个战斗队联合声明的出笼，是高、安、郑之流精心炮制的产物，它得到了社会上“二月逆流”派的大力支持，代为印刷、散发。“联合声明”就是“颠覆红色政权的联合纲领”。声明的发表充分地暴露出反革委会、颠覆红色政权的狼子野心，使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猛醒过来。宣告了他们的灭亡之日即将到来。

△ 1967. 8. 2.

△晚上，在数二楼 428 室召开地质系一些师生形势串联会，讨论校内外形势，研究怎么做？

会议由莫宣学、李振海主持。有刘肇昌、万天丰、叶德隆、郑伯让、邓晋福、李明哲、刘文华、毕先梅、王宝瑜、吴瑞棠、梁定益、郭铁英、闻立峰、阮天健，

骆庭川、王珍如、叶俊林等参加。

发言的主要内容有下列几点：

（1）文化大革命到了新阶段，校内运动必须与社会上运动联系起来，不能关门搞斗批改；朱成昭的问题也要联系到社会上问题一起考虑。

（2）校内两派斗争的性质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一定要干下去；今年一月份来，我院究竟立了什么功？

（3）非到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不要拉队伍，应在内部斗争。“分裂”只能是错误者对正确者而言。正确者向错误者的决裂斗争决不是什么“分裂”，对分裂一反对，二不怕（这段有关分裂的论述，是莫宣学讲的，他和 6.29 郑伯让在筹建《七一整风串联会》上的发言完全一样，莫是郑的传声筒）。

△ 1967. 8. 3.

△上午，在化学楼 117 室，召开地质系部分师生形势串联会。

会议由莫宣学、李振海主持。有吴瑞棠、梁定益、万天丰、刘文华、王珍如、阮天健、骆庭川、郭铁英、林秀伦等参加。

（1）由李振海传达田春林找关锋谈我院情况后关锋的指示。

1)在地院批朱符合大方向，阻力来自于革委会。

2)杨雨中怎么还在革委会里工作。

3)要两位与朱斗争坚决的人陪他去东北。

（2）说：“朱派整了王大宾的材料，并传在适当的时机要抛出来。”

（3）说：“革委会搞了一个调查朱成昭的七人小组，只有一人是彻底整风派，其它都是‘朱派’，还有死保朱的，为朱开脱罪状。”扬言“对此要密切注视和采取相应措施。”

△ 1967. 8. 4.

△在教二楼 310 开会。

由王振东传达关锋的指示。

杨淑荣说：“我和李明哲同去红旗杂志社，这次去的态度与过去不一样，比较明确地表示支持我们，精神与关锋的指示是一致的。在我院批判朱成昭是符合斗争的大方向”。

李明哲说：“他们提出，当前形势要我们注意揪军内一小撮，这是毛主席的战略部署。这次文化大革命，第一步是搞彭、陆、罗、杨；第二步是搞刘、邓、陶；现在是揪军内一小撮”（找的是周英、李惠让）。

△晚上，地质系部分教员在化学楼 117 召开串联会，讨论形势。

由莫宣学主持会议。有郑伯让、叶德隆、刘文华、王宝瑜、郑雪禾、吴瑞棠、梁定益、万天丰、郭铁英、王珍如、阮天健、曲一华、于崇文、林秀伦等人参加。

首先，由郑雪禾传达了上述的内容。莫宣学引导大家讨论校内外的形势。他提出：“现在校内外这场斗争。究竟是什么性质？是两条路线斗争？还是派性斗争？”看法并不一致。

于崇文传达 7.29 周总理在中南海接见中国科学院两派的讲话内容，歪曲为可以成立两个总部。

郑雪禾批评郑伯让“现在不大敢出面抓工作”，郑伯让表示基本接受这意见。出来抓工作。

△ 1967. 8. 7.

△召开地质系《大批站》成立大会。

由李振海传达下列内容：

(1) 传达周总理 7.29、7.30 在人大大会堂接见中国科学院代表的讲话。传达的目的是将其歪曲，为搞分裂提供理论“依据”。

(2) 传达关锋指示：你们学校批朱是不违背大方向的。朱是有背景的。你们怎么连个朱成昭也对付不了。你们要追他的根……这个根源在革委会，应当发动群众，杨雨中不行，我不要，我要与朱成昭划清界限的。不要怕乱嘛！乱才能乱出个好局面。

(3) 传达林杰的意见：朱成昭不是一个简单的人物。你们要注意他们的行动。“七一”串联会旗帜是鲜明的，造反有理嘛！主席的部署是早就搞好了的，现在是搞军内。朱成昭的要害是反对中央文革，要抓他与刘邓的联系。杨雨中这个家庭出身如何？社会关系？你们要追朱成昭与一些人乱七八糟的关系，不是生活问题，而是追政治问题。

△杨淑荣和李明哲去找周英。因关锋要两个人去东北，他（她）们就去反映情况。不让朱×和黄××去东北，周英答应给反映上去，并问“这两个人怎么保朱？”杨说不出来。周问听说还建议让你和蔡新平一起去？……周问聂元梓和聂树人有无亲属关系，还要谈革委会常委的情况，杨、李汇报了。周英说：“你们应该有个简报。成立××组，我们都看的是革委会一边的材料。你们搞了一定送一份来……”当时李贵让他们与院专案组一块搞，周英说：“他们保朱，你们才是真正的反朱。你们怎么能与他们一起搞呢？”回校后就分开搞了。周英还说：“他们要抓后台就来抓我，朱成昭反中央文革嘛！”

△ 1967. 8. 上旬

△月初《大批站》成立后的一天晚上，大约十点钟，高元贵找安静中，到莫宣学家。在场的还有江祖如、王暄堂、万天丰，吴瑞棠、蔡新平、周永璋、殷维侯等人，是个研究今后怎么干的决策性的会议。

安静中和“二团”对大批站排斥二团参加不满。二团提出要联络十几个战斗

队自己干。要和北航联系，发表一个声明。同时反对革委会和大批站。

高元贵说：“不能反对大批站，这是一道线”。并叫安静中亲自出马领导，想法进入大批站，还叫王暄堂把机关干部组织起来。

会上决定让江祖如帮助二团着手写声明（即后来的十五个战斗队联合声明）。

在谈到今后怎么干时，蔡新平说：“我们联络一些战斗队，大约在十个以上，发表一个声明。一方面反对革委会，另一方面反对大批站。大批站是机会主义的，对外要有分析和选择性的联合。准备联合北航红旗。如果事情失败，就将十几个战斗队拉到一个地质生产队去进行生产劳动。到哪个生产队，与地质部一兵团联系决定。”

安静中表示：按这种办法做，可能是一条出路。

会前，高元贵在王暄堂家（东三楼 315）部分干部、教师会上谈了话，他用“一切阶级斗争，都是为了夺取政权”来回答有人提出的“是否是夺权的问题”。还说：大批站就是第二个总部。参加会的有纪群、任端芳、王宝瑜、叶俊林、池际尚、江祖如、邓兆伦、陈安民、万天丰等。

△在教二楼三层召开会议。

陈学敏主持会议，他说：现在主要是揭发、批判朱成昭。下一步提出改组革委会。

还有人提出要成立《大批站》广播台。没取得统一的意见。

△当各系纷纷成立大批站时，高元贵在原院办对王暄堂说：你把机关干部组织起来，成立机关大批站。王暄堂答，机关干部对他意见大，不行，“最好你（指高元贵）领头来干”，高认为他不是老造反派，没有本钱。

△8.8.勘探系大批站成立。

△8.9.地质学院大批站成立，并发表公告。

△“大批判联络站”成立后，周英、林杰、红旗杂志记者问过陈学敏他们五次，问他们对外政策怎样？十分关心“大批站”的建立。

△ 1967.8. 中旬

△地质系《大批站》教员在教八楼 120（地化教研室）召开形势串联会。

会上，于崇文介绍地化教研室讨论形势的情况。郑伯让谈了几点意见（内容不详）。

刘肇昌念了《大批站》搞的革委会委员对朱成昭问题态度的上报材料。

莫宣学说：“二团最近要发表一个声明，安静中和郑伯让都看过。调子比较高。院里提到小资产阶级掌权，校外否定两大派，肯定北航。可能会有反应。先给大家打个招呼，有个思想准备。”

△清华《红教工》派往我院的联络员，反革命分子来普炎，清华批刘邓陶战

团的同学到北翼楼二层找周永璋、蔡新平，由蔡新平介绍他们如何同“朱派”作斗争的和受压制的情况，革委会是朱派的，对外政策是不对的等等。

△一天，来普炎到安静中家，见有六、七个人正在看联合声明的底稿，提到王大宾对朱成昭的斗争是机会主义的。

△一天，江祖如、周永璋、蔡新平到清华甲所介绍我院的情况。

△十五个战斗队联合声明，于 8.17 出笼之后，在学 12 楼 217 室召开各系《大批站》代表会。

会上，对《联合声明》发表了不同程度的看法。

散会时，江祖如对郑雪禾说：探工是既得利益者，当然他们不要革命了。

△8.17. 十五个战斗队联合声明出笼的这一天，安静中对高元贵说：“原稿棱角太多，我给他们抹掉一些棱角”，表明安静中对这个声明不仅看过，还修改过。

△十五个战斗队联合声明出笼前，在化学楼召开的地质系部分教师的会议上，郑伯让说：“十五个战斗队的声明我看过了，认为调子太高，先给教员打个招呼”。

在这次会上，还研究了各教研室批朱的任务。

△十五个战斗队发表后，在教二楼三层（？）东头开了一次会。

周永璋在会上说：“三军对地院东方红很有意见”。还说：“三军对十五个战斗队声明的态度是非常支持的”。

△8.11.地院大批站发表严正声明，强烈要求革委会必须按关锋所提出的条件，派和朱成昭划清界限的人去东北。

△《湘江》《一月风暴》等战斗队，按照关锋给大批站的指示的调子，写了许多大字报，大叫“批朱的阻力来自于革委会”、“批朱阻力的根源来自于革委会”、“批朱完全符合大方向”等等。

8 月中旬，高元贵与颜慰萱在城里汽车站下公共汽车时碰上，他们站在马路旁边谈了十几分钟，高元贵首先问了一下勘探的一般情况，并问翟裕生与赵鹏大的情况。颜告诉了高元贵，颜说，她是支持大批站的，勘探系有许多人同情大批站，怎么办好。高元贵说：“可以组织起来。你不要怕，我不是在‘七一串联会’上公开讲过话？我这样年纪都不怕，你们怕什么？”

△ 1967. 8. 20.

△在教八楼 308 室（原通知在 228，后移到 308）召开由地质系部分师生参加的讨论校内外形势和拉不拉队伍的一次重要会议。

有二团全体成员，安静中、王暄堂、郑伯让、江祖如、郑雪禾、叶德隆、刘肇昌、吴瑞棠、梁定益、莫宣学、万天丰、李振海、张赓祥、张台甫、于众、李明哲、杨淑荣、呐喊、小小老百姓等卅多人。

蔡新平主持会议。

周永璋说：“蒯大富最近同我谈，叫拉出来干，有一百人就可以，他们可以支持我们。还提出叫我们安广播台，供应我们广播器材。昨晚从大会堂回来，叫我同乘他的车，开到校门口，我准备下车了，老蒯说：开进去。到学九楼十字路口才下车。这就表示老蒯公开支持我们。我们究竟怎么干？请大家讨论讨论形势。”

殷维侯说：“十五个战斗队的声明，我们的想法调子不提高些，引不起反应，没有意思。提高些是准备让他们跳一跳。”

周永璋说：“这个声明的价值，就在于对外路线的看法。要没有这一条，就没有什么价值了。从中央最近的态度看来，对北航是树的，我们提一句有好处。”

关于拉不拉队伍，有两种看法：

（1）地质东方红虽是一个组织，但没有生气，半死不活。有两个组织，就有矛盾。有斗争，有发展，分出来有好处。

（2）分出来要扣上一个分裂的帽子，搞得最好也不过是清华 414 那样，僵在那里也是被动。再说广大东方红战士不愿分裂，能出来干的没有几个人。

周永璋、蔡新平主张，趋向于拉出来干，周永璋说：只要我们旗帜鲜明，斗争得力，群众是会过来的。殷维侯认为：“前途不妙，最多搞成个清华 414 最了不得。”郑伯让说：“不要打什么旗号，先干起来再说。”王暄堂也自报奋勇地说：“我可管资料，守电话。”

安静中表示同意蔡新平的意见，但具体内容上说得很含糊。有人追问他到底同意不同意拉队伍，他不表态。

△ 1967. 8. 下旬。

△在 8.20.左右，清华托德坚、来晋炎到官道公社找王大来，向他讲了当时我院的情况，并带去联合声明及一些大字报的油印材料，鼓动王大来回地院干。

△清华来晋炎找蔡新平，问蔡有什么需要支持的，蔡让他们帮助印朱成昭的材料。这材料印好后送安静中家，并给上报了一份。

△清华在大操场开大会，王大来、蔡新平、孙司权、周永璋，还有一个女同学（大概是万慧祥）都去参加了。

△由陈学敏召集会议，除本院《大批站》各系代表外，还邀请了机院、体院、财经、锻造几个院校的代表，调查对地院对外政策上的意见。

△ 1967. 8. 21.

△上午十点钟，在教八楼 308 开骨干碰头会。蔡薪平根据 8.20.讨论的情况，提出初步意见“不拉队伍，先干起来”，“成立宣传组和外联组”。

宣传组由蔡新平、殷维侯、莫宣学负责，外联组由周永璋负责。

参加《大批站》工作的主要成员有郑伯让、江祖如、莫宣学、叶德隆、刘肇昌、刘文华、毕先梅、梁定益、吴瑞棠、万天丰等。其中多数是委员和战斗队长。会上，江祖如向郑雪禾提出，要在化学楼借房子，还想安电话。

△ 1967. 8. 25.

△地质系大批站发表“关于我院大批判的严正声明”提出：革委会在对待大批判方面犯有严重错误，必须在批朱同时认真检查。

△安静中亲自为机关《八一八》起草了一个“关于形势的声明”，这声明拒不承认院革委会是红色政权，声明认为“大批站”的成立是必要的。“要坚决支持大批站的一切革命行动”。有人不同意贴出去，安说：“声明不管写的行不行，现在我院干部就是私字多，不敢出来说话，你们能出来说话就好。”

△ 1967. 8. 26.

△晚上，在教八楼 114 讨论形势。

陈学敏主持会议，有王大来、江祖如、梁定益、李振海、汤鸣皋、陈凤英、杨淑荣、于众、曹敏九等廿多人参加。

王大来说：“回来后了解些情况，与王大宾也谈过几次。我们学校的错误主要是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外要除‘三害’（聂、蒯、韩），对内包庇朱成昭，把同志当成敌人。”

有人让王大来留下来，王提出两个办法：（1）造反不走了，但这个办法是站不住脚的，就像上次戚本禹让回去一样，只好走。（2）让王大宾通过市革委会留下来，是可能的。

为了加强对校外形势发展的了解，陈学敏叫郑雪禾在《大批站》内搞个“动态报”（郑也为这事到北航了解了情况）。

△ 1967. 8. 29.

△下午，在教八楼一层地化教研室办公室开会。成立《大批站》大字报编委会。研究各单位联系组织落实和其它宣传工作。

会议由毕先梅主持。有郑伯让、骆庭川、丰茂森、万天丰、朱有光、王顺金和七、八个学生参加。

△晚上，在学 12 楼 217，由陈学敏主持，有万天丰、王顺金等廿多人参加，准备第二天市革委会李冠英召开座谈会时，如何分析形势的问题。

△ 1967. 8. 30.

△上午（？）在教二楼 408 室，主要由杨淑荣介绍朱成昭的材料。

△ 1967. 8. 31.

△地质系旧总支干部组成的《经风雨》战斗队，贴出“为什么干部条件最好的学校反而落后了？”的大字报。攻击革委会是执行一条宗派主义的干部路线。最

根本的原因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流毒在作怪。

△八月底，王大来回校，高元贵和王大来在学 12—104 谈了一下午。王大来要高元贵谈对当前形势的看法。高说：“我主张对外走第三条道路，坚决跳出北京两大派的圈子。革委会成立，是朱派压着蔡派成立的。革委会只有叶德隆一个人是蔡派，严格地说：是结党营私。十五个战斗队的声明，对内提得过高，点名也过多，对外则提得不够。”在这里高元贵恶毒地攻击院革委会，同时又叫王大来拉队伍，他说：“你不是对探工与水文很有影响吗？你最好把探工和水文另行组织起来，另搞一套调子，要看群众的接受水平。”

一九六七年九月内容提要

九月，是“二流”派最疯狂的一月，也是他们开始破产的一月。把院革委会污蔑为“关、王庙第二套班子”的“二流”们，把王力、关锋、林杰的垮台之日，看成是他们妄图搞垮革委会的大好时机，就兴风作浪，四处活动，企图配合师大反革命事件，一举推倒我院红色政权。

在短短的六、七天时间里，无数次的黑会都在研究着对付革命委员会的策略，大字报矛头也一直对准我院红色政权。《大批站》领导核心进行了改组，广播台也叫了起来，小报也差点出笼。社会上“二流”派对其的支持更加公开和大胆，答应给予广播器材、纸张等物质上的大力支持。高元贵到处游说，煽风点火，王大来也三顾地院，与高、安策划于密室，点火于基层，赤膊上阵，亲临指挥。想当时“二流”派们，笑得多欢，跳得又多高，简直不可一世，真有点天下即是他们的了劲头。

中央文革对“师大事件”的表态，宣告了“二流”派们黄粱美梦的破产，迎头痛击了这股逆流。他们有的不干了，可有的还硬着头皮充“好汉”。这时，安静中急忙为小喽啰们鼓气，说什么要正确理解中央首长讲话。王大来见势不妙也溜回官道，待机再来。这只能暴露他们心中的空虚，根本不能挽救他们失败的命运。

具有几十年反革命经验的高元贵，总结出了一条反革命经验：“只有团结群众，才能解决革委会的问题”。于是，从九月七日以后，“二流”们按照高元贵的这一授意，积极地串联，组织队伍，勘探系教员数次形势串联会的召开就是一例。安静中也亲临串联会做起报告来了，大胆的介绍了自己是《大批站》的核心成员之一。

高元贵对《大批站》的关心和支持，博得了“二流”派们的欢欣和赞扬，于是院内“结合高元贵”的呼声四起，大肆攻击我院革委会是执行了宗派主义、实

用主义的干部路线。说什么“我院干部的阶级阵线已经基本清楚”，还把革委会领导人和群众之间的矛盾说成是当时矛盾的核心和实质，企图引导群众把斗争矛头对准革委会，而不是阶级敌人。提出这种看法的就是原政治部干部安静中、吕禄生之流，其用心何在，不是昭然若揭了吗？

△ 67年9月1日

△晚上，在教二楼三层东头一个办公室，有安静中、王大来、郑伯让、陈学敏、周永璋、蔡新平、郑雪禾等二十多人，研究下步工作，决定9月2日召开《大批站》全体大会，让郑雪禾在会上作校外形势报告。

△ 1967年9月2日

△上午，在教七楼307室。召开《大批站》内部形势讨论会。安静中、江祖如等参加。

安静中告诉郑雪禾：“学九楼前《警告林杰》的大字报是昨晚清华团派来贴的，这张大字报上月在北大就出现了。”又说：“周英被抄家，关锋可能有问题。”

郑雪禾介绍了校外形势。

江祖如谈校内问题。他说：“我院革委会执行的是一条反革命的路线”。

晚上，在大饭厅开大会。由杨淑荣介绍朱成昭的材料。江祖如、蔡新平谈校内、外形势。传达当天下午清华鲍长康对北京形势的分析报告。

△晚上，王大来在安静中家（东三楼201室）谈探工系的情况，后因东北某小学教员陈闯要见王大来，把郑伯让、王暄堂、江祖如、莫暄学、杨淑荣、蔡新平和二团的其它成员都叫到安静中家，曹敏九也在场。

陈闯问：“这都是你们的人吗？你们的后台还有没有人？一个组织核心很重要！”安答：“我就是最大的后台。”陈说：“蔡新平我是相信的，安静中我也知道，地院的情况我了解，蔡派有希望。现在师大同学已经动起来了，我给他们教员点了火，还不敢动。今天来找王大来了解地院的情况。这是两条路线的斗争，是一场决战。你们应该把队伍组织起来”，又劝王大来留下来干，说：“我可以到市革委会去替你说一下。”

过一、二天，杨淑荣告诉郑雪禾：“陈闯在师大托人带信说叫我们快把队伍组织起来。”

△ 1967年9月4日

△上午，由陈学敏主持，在学十二楼二层开会。

有周永璋、万天丰和地质系各教研室的人参加。研究批朱和当晚《大批站》广播台广播的问题。

周永璋说：“广播器材、机子都有了。安装准备要地质部一兵团的人来帮忙。”

陈学敏说：“前几天地质部516头头，参加三军党委扩大会，三军等负责人

说：‘你们还和地质东方红搞得那么紧，地质东方红越来越右了。’头头说：‘没有呀！我们和《大批站》搞在一起。’三军等负责人说：‘那好。’”

会上，还做了分工。

△晚上，《大批站》邀集了不少外单位召开批朱大会，介绍朱成昭的材料。《大批站》广播台开始广播。

《大批站》广播台是九月初在教七楼三层一个大教室里开会决定的，通过陈学敏向地质仪器厂，孙司权、吴瑞棠向矿院借来喇叭。宣传工作由地质系教师负责。具体由梁定益、牛定杰组织，并由他们写广播台成立宣言。

当晚，在王暄堂家（东三楼 315 室）开会。有郑伯让、莫宣学、邓晋福、王暄堂、郑雪禾，交换对形势的看法。

九点多，《大批站》广播台被砸后，在安静中家开会，决定由殷维侯、莫宣学起草大字报投诉。

这天晚上，清华来晋炎来地院。

△程光华到高元贵屋（学 12—104），高指着楼上说：“这上头相当第二个总部”，“十五个战斗队的声明，大批站宣言我都看过”。

△ 1967 年 9 月 5 日

△在教七楼 307 室召开“9.4 事件”控诉大会。

由梁定益、万天丰、肖体修控诉他们被打的经过。

丰茂森提出：“现在我们应该成立革命造反总部。”

会议认为：“9.4 事件是个反革命报复事件。”

△《机关八一八》贴出“关于我院目前形势的分析和紧急倡议”，有意回避我院阶级斗争的实质，并把矛头指向革委会。提出：“革委会不能紧跟中央精神，在干部问题上有实用主义和宗派主义。东方红内部分歧，矛盾的核心和实质是革委会中的某些人和革命群众在对待和解决朱成昭问题上的严重分歧。问题的性质是如何彻底肃清其流毒。矛盾的实质是院内两条路线的斗争的继续，是复辟反复辟的斗争。批判朱成昭和斗争大方向完全一致，阻力来自于革委会。”这些看法，安静中并不同意，并极力反对。他认为革委会快完蛋了，在这时贴出这张大字报，“不就要起到原政治部那篇大字报（即 66 年 8 月政治部保工作队的大字报）的作用了吗？”

△ 1967 年 9 月 6 日

△上午，高元贵到地史教研室对王鸿楨、何成舟、朱志敏等近十人说：“现在必须从两大派的圈子里跳出来，才是出路”，“革委会的对内政策是被朱成昭思想体系所左右，派性占上风。对外政策同样是宗派主义，干扰主席战略部署。总之，对内对外都是朱成昭的流毒，都是派性控制，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这是肯定的。”

又说：“大批站的方向是正确的，但方式方法有问题，如设电台，有些冒进，但既已冒进就应坚持，不能后退，否则更将陷于被动。大批站的大方向是对的，但斗争是长期的、艰苦的。”高还煽动说：“9.4事件就是聂树人怂恿的，就是他主持的。”

△上午十点左右，在学九楼前十字路口开控诉大会。

这时王大来从清华回来对郑雪禾、李振海说：“老蒯和韩爱晶商量好了，准备跟王大宾摊牌，最后争取他。要是他不过来，我们就跟他干了。”又说：“现在我们这支队伍不行，要赶紧组织起来。”建议马上开会讨论，决定由李振海、郑雪禾分别通知《大批站》和《二团》方面人员，于下午一点在化学楼407开会。

郑在东三楼219室找到安静中（安一个人在李明哲屋里）。安说：“现在我要冷静地考虑些问题，为什么那天专门打我们二团和地质系的人？”并表示下午不去开会了。

△中午会议由陈学敏主持，有王大来、曹敏九、李振海、莫宣学、丰茂森、林名章、江祖如，二团（周、蔡没去）及地质系部分学生参加。

丰茂森积极主张拉队伍，要在“组织上独立起来”。江祖如和二团出于他们反革命的策略表示不同意，但没谈出多少道理来。因为意见不一致，就推丰茂森和呐喊先起草一个对形势的声明。

九月初这期间，安静中对拉队伍一事没有明确表态。有一次安静中把郑雪禾拉到莫宣学家，单独对郑说：“要看老郑（指郑伯让）的意见。现在干的都是地质系的力量呀！”

△晚饭后，周永璋被抓。北航闻讯来了解情况，由郑雪禾带到安静中家。安说：“周永璋不是5.16分子”，并托北航代寻周的下落。

夜十二点，北航派人到郑雪禾家，告明周永璋在钢院附中。

莫宣学对郑雪禾说：“安静中、郑伯让他们准备9月7日下午去三军，有车。”

△晚上，九点左右，二团吉让寿在平安里把高元贵叫到解放军报社去，在接待室里的还有蔡新平、肖体修、殷维侯等，他们要求见肖力，被拒绝了。高元贵为二团打气说道：“被打就有理了。”二团对高元贵说：（1）15个战斗队声明是机院东方红给印6000份。（2）周永璋不是5.16。（3）准备到机院去住。

高曾对吉让寿说：“能团结群众，才能解决革委会的问题。”给黑二团出谋划策。

△《大批站》许多战斗队纷纷发表“9.4事件”声明，声明要点是：“9.4事件是阶级报复，是地院资本主义复辟的铁证”，“是革委会长期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暴露”，“是白色恐怖”，“是血腥镇压的事件”。

△ 1967年9月7日

△上午，王大来、田春林在北航与韩爱晶、蒯大富同往电影学院后院，和“天派”头头一起开会，在场的蒯、韩、井岗山、田东等都叫田春林干起来，表示支持他，王大来也批评田春林“胆小，怕事”，鼓动他大胆地干起来。

△晚上，在西一楼213室，王大来召集王喧堂、江祖如、郑伯让等人研究形势。

郑伯让说：“学校形势正在发生急剧变化，对我们很有利，我们要抓紧这个有利形势，发动群众。首先，要争取王大宾。让他出声明支持大批站，站到大批站这边来，然后发动各个系，各个战斗队宣布加入大批站，这样就能打开局面，形势一下子就可以扭转过来。”

唐咸正说：“王大宾工作由我做。”

△上午，在教七楼307室，召开《大批站》大会，介绍周永璋情况。说明：周永璋不是5.16分子，抓周永璋是聂树人对周的打击报复。搞政治陷害的具体表现。

△上午，北航来人联系，到北航介绍情况，安静中问：“能不能在你们那里借到一间房子，开个会或者有什么事避避。”北航人走后安对郑雪禾说：“像我们这些人，他们可能要拿来斗的。”

下午，江祖如、刘肇昌、郑雪禾到北航动态组介绍情况（原先安静中研究是派郑伯让、江祖如、郑雪禾三人去），北航方面的人有：殷立新和学生一人。

江祖如作了全面介绍，要点：

（1）总部对朱是右倾的，在地院反朱有罪，保朱有功。

（2）介绍革委会里每个成员的情况，多为“朱成昭的代理人”。江说：“所以，我们要夺权，现在正组织队伍，准备接班”。

（3）详细介绍了周永璋、蔡新平和二团的情况，指出工作队打成反革命的教师、干部多数站在二团、大批站一边。详细地介绍了这些干部、教师的政治面目和所担任的工作，说明政治上是可靠的。

△下午。清华派车，王大来、安静中、莫宣学和清华《红教工》来晋炎同去三军海直《红联总》诬告革委会。

△在教八楼四层西头化学实验室开会。《大批站》各战斗队派人参加，有王大来、安静中、江祖如、郑雪禾、莫宣学、丰茂森、二团。

主要研究《大批站》的组织形式问题，有两种意见。

（1）王大来、牛定杰、丰茂森、赵国柱主张另成立一个兵团。称“东方红公社××兵团”，并认为这样“旗帜鲜明，可以争取群众”，“大批站名称本身就决定没有权力。只是一种召集机构，长此下去就成为争吵不休的俱乐部”。

(2) 安静中、江祖如、余九乡当时不同意另成立一个兵团。

讨论很久没有结果，暂定继续用《大批站》。决定由王大为、牛定杰执笔起草一个关于周景芳问题的声明（宣言）晚上讨论通过。次日清晨公布。

会上，汤鸣皋表示要写大标语和大字报支持师大造反兵团的行动。会前介绍了校外形势，说什么“谭厚兰不行了，我们学校也和师大差不多”。会议中途，郑伯让参加会议，并把会议归纳成四点：

(1) 我们打的是持久战，不是松劲消极。

(2) 全国形势如何看？校内斗争摆在什么地位？

(3) 校外斗争是什么性质，是一般原则分歧还是两条路线斗争？

(4) 要加强基层组织的思想建设。

△晚上，在教七楼 307 开大会，宣读起草的声明（宣言）并征求意见。

声明（宣言）的要点是：对革委会进行评价，对外政策是搞派性斗争，实用主义，是受黑手操纵的，犯了路线错误。我院革委会是周景芳一手炮制的派性产物，包庇朱成昭，搞反动路线式的压制反朱派，有先天不足，革委会已到了复辟资本主义的边缘。

后来，因王大宾同志打电话叫陈学敏到大会会堂开会，陈听到中央首长批评“蔡新平是极左派”，叫他们朱成昭的事不要再管了去搞大批判，之后，立即打电话给汤鸣皋制止了声明（宣言）的发表。

散会前，闻立峰讲了他上学部，有个常委跟他说：“我们支持地院大批站是三军的意思。”

△中午，在教七楼二层，由陈学敏出面召集大批站骨干分子会，研究“师大公开干上了，我们要不要公开干？”的问题。郑伯让在会上公开煽动说：“目前这样大好形势，我们应该怎么办？”

△由安静中直接操纵的《机关八一八》战斗队，贴出“快快跟上中央精神，大胆结合使用干部”的大字报，攻击革委会的干部路线是“宗派主义的，实用主义的”。文章说：“随着内部矛盾的激化，使用干部问题上宗派主义严重发展，最突出的是唯我观点论的实用主义态度。”

由地质分会委员刘文华操纵的《劲松》战斗队也出大字报，高叫“革委会执行的是宗派主义、实用主义的干部政策，实行朱成昭的张海涛式的干部路线，把持有不同观点的革命干部高元贵、安静中等推于革委会之外。”

△ 1967 年 9 月 8 日

△上午，在教七楼 307，由陈学敏传达江青同志 9.7 讲话。根据安静中的“旨意”删掉了“蔡新平是极左派”这一重要的内容。

听过传达，许多人泄了气，安静中主动为之打气，他说：“这是中央首长对

我们的关心，……”王大来也发了言。

因为有人不太想干了，《湘江》在陈学敏宿舍贴了张大字报，批评“太右了，胆小。不想干”。

这阶段，还准备由梁定益、牛定杰、丰茂森等负责办《地院东方红》小报，于9.7发刊。由机院、矿院供给纸张，后来没办成。

△晚上，在郑伯让家（眷六楼）开会。

有郑伯让、安静中、江祖如、王大来、莫宣学、蔡新平、杨淑荣、李振海、余九乡、陈学敏、吴瑞棠、刘肇昌、曹敏九、郑雪禾等参加。

会上，全文传达了9.7江青同志的讲话。

改组了《大批站》的核心组。

核心成员有：陈学敏、王大来、安静中、江祖如、蔡新平、余九乡、李振海。开始有郑伯让，江祖如说：“把郑伯让换成李振海，请老郑当高参”。后来加一名吴瑞棠，作为教师代表。陈学敏说：“郑老师也算一个吧！”会后，郑伯让说：“今天开得很好，解决了一个大问题”。

△地质系《经风雨》发表“严正声明”。警告革委会的负责人，声明说：“革委会的要员们，你们在黑手的操纵下，为刘邓干了不少坏事，只要你们迷途知返，反戈一击，将功赎罪，革命群众是欢迎的。不然是不会有好下场的。”《机关八一八》也叫嚷“革委会必须下决心斩断魔爪，揪出黑手”。

就在师大反革命事件发生后，他们要革委会向“樊立跃学习”。

△ 1967年9月9日

△下午三点，在学十二楼216召开大批站核心组改组后的第一次会议。

△ 1967年9月10日

△上午，在教七楼307室，介绍周永璋被抓后和出来的经过，指出聂树人在这事上有重大的责任。

△中午，勘探系余九乡、陈钟惠、翟裕生、颜慰萱、翁成敏等，在“一月风暴”屋里开串联会，会上余九乡谈了形势和意见，并研究分工串联各教研室的人。

会前，找高元贵参加会，高说：“我是常委，谈不合适，叫余九乡、陈学敏谈吧。”

△9月10日左右，革委会决定听取大批站的意见，高元贵事先向陈学敏通风报信。后因会议改期召开，高又借去大批站摸底为名，找陈学敏，提出“最好派一个人和我经常联系，以便及时交换意见”的要求。大批站派杨淑荣为联络员。

△ 1967年9月11日

自9.6周永璋被中学红卫兵抓走又被抢回来之后，《大批站》《二团》不断发表声明，刷大标语，攻击聂树树同志。9.11《二团》贴出“9.6事件是蓄谋已久

的政治陷害案”大字报，集中地体现出他们的立场和观点。

《二团》说：“为了挽救朱成昭的垂死命运，为了掩护真正的 5.16 分子，尤其是他们的聂头头，为了……为了打击地院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9 月 6 日下午发生了一起严重的政治陷害事件。”

△ 9.11 聂树人同志在大会上对 9.6 周永璋被抓一事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之后，《大批站》把矛头更是对准聂树人，大书特书。《红岩》《红心向党》一天出两、三篇大字报，一方面要“请教聂树人”，大谈“聂树人的爱和憎”，说：“身为常委的聂树人，倚仗权势，目无党纪国法，私自捕人，私设公堂，践踏六六通令”等，另一方面大谈特谈干部问题，说什么“我们干部的阶级阵线已经基本清楚”“结合和使用干部的阻力首先来自革委会，高元贵、安静中、王焕、王暄堂等同志实践证明他们是拥护毛主席、拥护毛主席革命路线、拥护文化大革命，站在无产阶级司令部一边的，是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领导干部，大节是好的”，言下之意，高、安应该立即结合，立即上台，聂树人应该下台。

△ 1967 年 9 月 14 日

△在教七楼 212，由余九乡组织勘探系部分教师串联会，有安静中、陈学敏、黄民智、颜慰萱、丰淑庄、卫冰洁、翟裕生、赵鹏大、郭群海、胡旺亮、杨栋、董镇、冉宗培、吕中文、陶继文、翁成敏、程永长、夏卫华、章金统、陈钟惠、赵永芳、霍承禹等参加。

安静中在会上发言，他说：

(1) 我要是想当官，放弃斗争就当上了官，恰恰是革委会中的某些人当上了官。

(2) 大肆吹捧、赞扬二团、周永璋、蔡新平。

(3) 革委会在朱成昭的问题上只讲反思想，回避他的活动。

(4) 介绍了大批站的组织机构。

会后，余九乡说：“咱们组织起来干，怎么样？”

△在 9.7—9.14 之间，勘探系还开了一次大批站小组会，有翁成敏、黄民智、丰淑庄、余九乡、黄凯生、颜慰萱参加，研究当时的形势和教员提出的有关问题。

△高元贵通过濮长萱把安静中叫到 12 楼 104 高元贵宿舍，了解周永璋是否 5.16 的问题。

安静中说：“周在三军无产阶级造反派最香，他参加过政法兵团刘富元反谢副总理的会，但周无多大责任。”

高建议对外联系要谨慎些，并谈了他对十五个战斗队的看法。

△9 月 15 日以后，高元贵在教八楼见到陈学敏，鼓动他拉队伍。高说：“革委会成员对大批站有不同看法，要团结群众，有力量才能解决两派联合问题。”

后来王暄堂也谈了类似的话，不仅鼓动拉队伍，还挑拨革委会负责人之间的关系。

△ 1967 年 9 月下旬

△九月底，由郑雪禾主持召开地质系教员座谈形势，会上有人提出：国庆后大批站再拉起来干。

△在教八楼 407 室，讨论《大批站》的存亡问题，有 20 多人参加，有两种意见：

（1）继续存在下去，成为召集大家交流情况，分析形势的一个机构。

（2）这样等于俱乐部，解散算了，将来有必要再重打旗号。

国庆节前，陈学敏写了解散声明，后来被烧掉。提出由陈学敏、蔡新平考虑写个摆成绩的总结，并讨论通过。没写成。

△9 月 20 日左右的一天晚上，在教八楼召开大批站骨干会，高元贵找陈学敏，对他说：革委会对大批站有两种看法：一是以王大宾、张海涛为代表，认为还属人民内部矛盾；一是以聂树人、黄振群为代表，认为已走到敌我矛盾的边沿。你们要团结群众，没有群众就解决不了革委会的问题。高元贵一方面挑拨革委会成员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鼓动大批站反对革委会，分裂革委会。

一九六七年十月份内容提要

这个月的材料我们收集不多，就从十月下旬这两件事来看，高、安、郑之流，在《大批站》受形势所迫，解散之后，还念念不忘一个“权”字，没间断过阴谋拉队伍搞分裂的活动。

安静中亲自出面召开座谈会了解各系师生中的情况，是桩反革命的调查活动。高元贵的特派员颜维萱也参加了这个会，他们对勘探系表面上是一派、思想上是两派的现状感到高兴。他们攻击革命小将掌权是不行的，慢慢还得靠领导干部起作用。”在他们看来，到头来“权”还得给安静中。真是反动透顶。

高元贵这阶段也积极找安静中了解动态，并凭借他多年的反革命经验，指挥他的同伙“要团结大多数群众，才能解决高、安的问题”。郑伯让“只要有 500 人就可以”这句话，彻底暴露了右倾分裂主义的真面目。

这个月“二流派”活动的特点是：在不利的形势下，头面人物躲藏在阴暗的角落里。窥测方向，研究对付革委会的策略。

△ 1967 年 10 月下旬

△十月底，安静中亲自召开会议，地点学 12 楼陈学敏宿舍，有陈学敏、余九乡、李振海、殷维侯、杨淑荣、曾婉娥、颜维萱、郑雪禾等人参加。

安静中说：“大批站解散后。没有在一起碰过头，今天大家来谈谈情况。地质系的教员现在很忙。今天不一定来了。”

颜维萱说：“勘探系表面上是一派，实际上思想不一致。”

陈学敏说：“现在革委会内部在审干，有委员心里空虚。”

殷维侯说：“革委会就是不结合安静中，我们还要提，有什么理由不结合？”

郑雪禾劝道：“别提了，核心是在斗争中形成的，这些年青人也是不行的，慢慢的还得靠领导干部起作用。”

△十月中旬或下旬，高元贵为了解动态要安静中到学 12—104 谈话，郑伯让说：“我去吧”（从这不难看出郑是个什么角色）。当高元贵谈到，他对吉让寿说“你们能团结大多数群众，才能解决革委会问题”时，郑伯让说：“只要有 500 人就可以！”当高元贵谈到“有些人历史上有问题（如梁定益）要少出头”时，郑伯让说：“我们（指他和岩石的人）不怕，我们是整风反右时的积极分子。”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份内容提要

1967 年 10 月 27 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关于已经成立革委会的单位恢复党的组织生活的通知”发表之后，高、安、郑之流认为时机已到，又从阴沟里爬了出来，四处活动，为篡夺党权而奔忙。

这阶段，高元贵抓勘探系，一贯走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路线的高元贵确已开始主动到《暴动》《大喊大叫》学生住房里登门拜访了，鼓动他们把同观点的人“串联起来干”。高元贵这种“敢于革命”的精神，蒙住了部分群众，为之大喊大叫，顿时地院出现了上十条类似“高元贵是受之无愧的当然的临时党委委员”的大标语。

郑伯让抓地质系，企图用 2:2:1 方案和恢复原支部的方针把党权夺到手。当时地质系要求召开党员大会，筹建各级党的临时机构的呼声最高，甚至扬言要“冲破阻力，自行串联”，地质系成为院整党问题的斗争焦点。

安静中这段时间住在医院里和《二团》的几个小丑开会讨论校内的形势，研究对付革委会的办法。他为了挽救失败的命运，弄虚作假，刚出院就召集人研究要搞什么“大批判”，但由于一贯热衷于的就是如何颠覆革委会，搞垮革委会，因此，大批判不仅搞不起来，就连一点迹象也表现不出来，用他们自己的话说：“他们（二团）兴趣不大，搞不起来呀！”

△ 1967 年 11 月上旬

△11 月 10 日，郑伯让、纪群、刘肇昌、王葆瑜、邓兆伦在纪群家开黑会，确定了地质系临时总支筹备组。提出了教员:学生:干部 2:2:1 的方案，郑伯让是

这次黑会的主谋，他说：“正式党员这一条一卡，我们这派的人就可以保证进入筹备组。”还提出“党员大会后，按原支部讨论酝酿”。

△11月11日，地质系郑伯让、纪群等对地质分会实行突然袭击，召开全系党员大会，传达中央文件，筹建临时支部，用事先酝酿好的五人名单上报分会。

△ 1967年11月中旬

△在教学楼12—104高元贵宿舍，高元贵和安静中、江祖如、蔡新平、余九乡等谈了一个晚上。

高元贵说：“革委会不突出政治，不能大力落实毛主席视察华中、华东的最新指示。复课闹革命不是院教革部的错误而是聂树人的错误。校内大联合的问题，恐怕一时解决不了。蔡新平不要在外搞调查，回校搞政治活动。还谈了对十五个战斗队联合声明的看法。

安、江等认为：王大宾到东北去不是养病，而是去开会。

△地院临时党委成立，没有高元贵，于11月17日《长征》贴出大标语：“高元贵错误要批判，高元贵工作要支持”、“高元贵是敢想、敢说、敢革命的领导干部，就是比王焕强”、“高元贵应进入临时党委”，表示支持高元贵。11月16日《暴动》《解放》等战斗队也贴大标语呼应：“高元贵是受之无愧的当然的临时党委委员”“彻底解放高元贵”“高元贵是革命干部、必须靠前站”“谁要把高元贵当作派性的牺牲品，谁就决无好下场”等等。

△ 1967年11月下旬

△建立临时党委时，有一天，江祖如跑到学12—104高元贵宿舍，对高说：“临时党委已上报，革委会不批准。”

△11月30（录入者注：疑为20之误）日下午，高元贵走进“暴动”“大喊大叫”房间（学12—103）说：“当邻居这么久，还不知咱们是同一观点的，以后咱们多谈谈，你们为什么这么多日子都沉默了？”当学生表示已失去心情时，高说：“像我们这么老的人还努力去干，你们年青就没了劲头……”“勘探系咱们观点的人不少，地质系也不少，你们应串联起来。”

△11月24日，高元贵叫田春林到他房间（学12—103），鼓动田春林拉队伍，对田说：“你除了在红代会工作外，要多到下面去，谁有群众，谁就胜利。”意思就是让田拉队伍和聂树人对抗。

△从11月22—11月24日短短的两三天时间里，地质系部分党员贴出了《大声疾呼》、《同声疾呼》、《坚决支持》等大字报，强烈要求立即召开党员大会，讨论恢复党组织生活，筹建各级党的临时机构问题。提出了“地质系恢复党的组织生活阻力来自于分会常委和极左思潮”，扬言“分会常委如再置广大党员群众意见而不顾，我们将自行串联”“把高元贵排挤在临时党委之外，是小资产阶级派

性的表现，必须坚决抵制”。

△ 1967 年 11 月

△一天下午五点多，郑雪禾、陈莹到医院看望安静中，见到蔡新平、肖体修、杨淑荣、张钦文在打扑克（他们是中午去医院的）。

安静中对郑雪禾说：“这次革委会对陈学敏的处理很客气，没拿出来搞，过去我们搞了什么，革委会都知道，我们是怀疑他的（指陈学敏）。”

从医院出来后，陈莹告诉郑雪禾：“听他们（二团）讲，还在医院开会哪。”

△安静中出院不久，蔡新平叫郑雪禾到安静中家研究大批判的问题。

安静中说：“昨天我们几个商量了一下，感到应该搞些大批判和学校斗批改，但我们过去这方面的资料没有准备，搞起来比他们难。他们（兵团）兴趣不大。”

郑表示同意，提出：“咱们这边同学也可以下教研室吧！”

后因二团学生不感兴趣，没搞起来。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

“中共地院核心组”的成立标志着广大革命师生员工对高、吕、安、郑之流夺取党权斗争的胜利，是毛主席建党路线的伟大胜利。高、吕、安、郑之流恨之入骨，疯狂地进行着临死前的挣扎，策划于密室，点火于基层，在全院掀起了一个把矛头对准聂树人同志，实为否认“中共地院核心组”的逆流，其声势之大，是自 9 月份以来所空前未有的。

这场斗争完全是在高、吕、安、郑的直接策划下展开的。

高元贵叫勘探系按原支部组织起来学习、整顿，明确指出：现在是争取党权的问题。而安静中感到过去斗争“右”了，颇有要大干一场的决心。郑伯让在地质系 2:2:1 的阴谋破产之后，又玩弄出分会中正式党员组成核心组的新阴谋。

翻开《二团》在这阶段的大字报，不难看出：大字报里所写的基调，都是高、安之流给定的，如：我院存在着一股极左思潮呀、形左实右呀等等

和过去一样，每到斗争激烈阶段，《二团》总是要花笔墨为高老夫子大喊大叫，大书特书的，这阶段也不例外。

△ 1967 年 12 月 1 日

△11622《永向前》贴出“谁说批高没有派性”一文，实为高元贵代言，高元贵、安静中十一月中旬对殷维侯说：“复课闹革命不是教改部的错误，而是聂树人”，作者说：“为什么是聂树人把复课引入歧途，偏要把高元贵当替死鬼？为什么教育革命深入不下去，却把最大的阻力的桂冠送给高元贵呢？”高元贵：“我坚持 64 年以后，执行的是毛主席的教育路线”，而作者也说：“为什么批高的文

章大多是空空洞洞？为什么许多批高勇士，无视高元贵关键时刻敢于抵制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并一贯受黑线打击的事实，而对高元贵全盘否定呢？”

△ 1967年12月3日

△二团孙司权到高元贵家（城内）了解我院建立中共地院核心组的问题，高详细地给予介绍，并在中挑拨革委会成员间的关系，散布对聂树人的不满情绪。他说：“校内 12.2 的广播是聂树人搞的。”“你们问题是脱离群众，所以没有力量。”“蔡新平要真理，不要群众，是错误的，说严重一点，就是托洛茨基主义。”

△晚上，高元贵主动到学 12—103 和于众、余九乡【谈】核心小组成立的情况，攻击李贵和聂树人同志。他说：“通告怎么搞出来的，这还不是由李贵、聂树人一手操纵的，他们【想】怎么干，就怎么干，这是随他们的意见决定的。”

△这天曹添也拜访了高元贵，谈有关中共地院核心小组的事。高元贵说：“以聂树人为代表的极左思潮要抵制，我给大批站的人打气，原他们都泄气了，现在又干起来了”，还说：“今天给你漏了底了，要是《暴动》《二团》和安静中揭我，我就完了。”

在整党问题上，高说：“整党这问题很重要，要组织力量抵制，我专门找叶德隆谈了一个下午，叫他回去和老郑商量。”

△ 1967年12月4日

△高元贵问《暴动》成员，“你们现在准备干什么”，回答是“抓住核心小组的问题，把聂树人搞臭”，“串联起来一起出它一批大字报”。高元贵说：“串联起来就好了，都集中这个问题，一干就有声势了。”还说：“你们了解不了解聂树人与林杰有何关系，林杰给了他们什么指示，难道我们学院连一个 5.16 分子也没有？我有怀疑。”言下之意，聂树人可能是 5.16 分子。

当《暴动》成员向高元贵提出：“你是不是发表公开声明，领着我们干”时，高说：“这个不行，我是革委会常委，哪能公开领导你们反革委会！”“目前他们的力量还很强。革委会控制了他们的基本群众，《红色尖兵》还很得势。”还说：“目前的问题是物探一年级，红色尖兵、山鹰、海燕等十几个战斗队为代表的极左思潮，这是需要批判的。”污蔑、攻击革命小将，并将矛头指向命小将。

△ 1967年12月5日

△《永向前》、《大喊大叫》、《暴动》等战斗队，在高元贵多次工作之后，连续不断地对中共地院核心小组的成立发表声明。声明说：“由聂树人一手策划建立的中共地院核心小组是完全非法的，是聂树人篡党阴谋的大暴露”，“聂树人是地院赫鲁晓夫式的人物，聂树人是依靠阴谋手段上台的，并采用了一系列赫鲁晓夫式手段来巩固自己的地位”。高元贵说：在整党问题上的极“左”思潮要抵制，而《暴动》说：在整党问题上存在激烈的两条路线的斗争，以聂树人为代表的形

左实右的机会主义思潮必须批判”，《永向前》也大叫“我们决心同野心家聂树人和极左思潮浴血奋战到底。”

△ 1967年12月7日

△早晨七点刚起床，高元贵就到学12—103对于众说：“昨晚常委会决定今天下午或晚上开队长会议，研究当前运动以什么为中心的问题。昨晚通知你们已来不及了，因而一早来找你们。你们前几次会议都准备不好，这次要很好地准备一下。你是不是把其它人也叫来，到我屋里去商量商量。”

这天，早饭前和整个中午在高元贵屋召开有关人员（江祖如、蔡新平、余九乡等）的会议，研究对策，破坏全院战斗队长会。

高元贵说：“你们这几天出的大字报声明不错，声势不小……，看来以后你们要串联起来。”还露骨地说“现在是争取党权的问题”，并表示同意安静中曾说过的“过去战略上是左的，在战术上是右的”说法。

△ 67年12月上旬

△在郑伯让、刘肇昌的提议下，郑伯让、刘肇昌、纪群、毕先梅、王葆瑜、叶俊林、莫宣学、顾锡瑞、江祖如、林秀伦、邓兆仑等又在纪群家策划篡夺党权。他们认为，恢复组织生活的条件已成熟，可以建立临时支部，要批判当前的极左思潮。郑伯让说：“不要按专业或年级划分支部，我们这边党员是多数，有不少支部是由我们这边的人组成”，江祖如说：“别的权可以不要，党权一定要，打破头也一定要”。

△12月11日《红旗展》战斗队和12月13日《在险峰》等战斗队贴出的大字报，都明确地提到要夺党权的问题。作者否定中共地院核心组的性质，认为“它是极左思潮和形左实右做法的集中表现，是带着浓重的‘私’字和强烈的派性，为个人或小集团夺党权的突出表现”，还说：“聂树人挑起这场斗争的实质并不是什么无产阶级革命派要不要掌握党权的问题，而是为他个人争党权，这才是问题的实质”。其目的是想通过搞臭聂树人，否定中共地院核心小组的性质，为他们进一步夺党权制造舆论。

△ 1967年12月19日

△高元贵到学12—103对《暴动》成员说：“现在革委会是靠物探一年级、红色尖兵、山鹰、海燕等十几个极左派跳裸体舞，根本没有发动起群众来。”“你们应该到物探系老师那儿去，让他们按原支部组织起来学习，加以整顿。”再次攻击革命小将，并策划恢复旧支部夺取党权的阴谋。

△ 1967年12月中旬

△中共地院核心小组成立之后，高元贵一方面鼓动《暴动》《大喊大叫》等把矛头对准聂树人，另一方面直接插手各系，积极活动，争夺党权。

在勘探系，找余九乡，叫他学习一年级用起来造反的办法，成立整党领导小组，和颜维萱、余九乡都详细地研究过如何争夺勘探系教师和学生中党的领导权的问题。

△革委会内部开展“斗私批修”，高元贵找叶德隆商量对策，商量结果是在台上亮明观点，并检查退休的思想。

△地质系在大饭厅针对整党问题开辩论会，散会后郑伯让、纪群、刘文华、曹添等人在东饭厅前树下交谈，高元贵上前说：“我建议地质分会‘斗私批修’半个月”，郑伯让说：“革委会首先拿出样子来，革委会要有诚意。”

△12月20日晚上，在莫宣学家（东三楼216）召开地质系旧总支部分人员会，郑伯让看到2:2:1方案已破产，在会上又定了调子，摆出中共地质系核心小组由分会中正式党员组成，想以此达到他夺取党权的目的。

△ 1967年12月下旬

△地质分会委员刘肇昌在南翼楼105召开战斗队长会，汇报各教研室大批判的情况，有郑伯让、刘肇昌、莫宣学、梁定益、万天丰、郭铁英、沈今川等参加。

郑伯让说：“听说聂树人去东北看王大宾，也可能去开会。据传闻‘地派’过去还开过不少会。”

一九六八年一月

一九六八年元旦社论发表，对“二流”派判处了死刑。高元贵凭着他反革命的嗅觉，开始布置其同伙退却隐藏起来。叫他们要注意在表面上改变对革委会的态度。就是“要举双手拥护革委会”“要支持革委会举办的第一期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不管他打的是‘迂回战’还是‘边沿战’，都应支持”。于是《二团》也奉旨贴出“祝贺院革委会第一期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召开”的大字报，内容不外乎还是影射、讽刺，同时也表露出对这学习班的怀疑和不信任。

高元贵利用《二团》的“整风”机会，再次提醒他们“不要脱离群众”，否则“人家就把你打成反革命”。这就是高元贵“谁有群众，谁就胜利”的实质。

△ 1968.1.

△元旦社论发表后，高元贵让王暄堂转告安静中“你们要转变对革委会的态度，大批站后期的做法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谁反对革委会，就是反革命，革委会不能一切都错了，对的你们要举双手拥护，错的，应许你们提意见。”

安静中出院后，找高元贵，他说：“谁反革委会就是反革命，不至于这样厉害吧！”还说：“我亲自去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指空军）征求对十五个战斗队声明的意见，他们认为：提的过低（指小资产阶级掌权）。没有无产阶级气魄。”并

攻击王大宾说：“大批站是王大宾搞起来的，王大宾×月×日住医院时，曾叫一个亲朱分子整康老材料。王大宾不敢整我，整我，就全盘说出来。”

△革委会开办第一期常委学习班，高元贵对余九乡说：“你们要支持这次学习班，这是李一民同志在常委会提出来的，通过时，好不容易。你们出大字报，说是阴谋，我极不同意，这不利于团结，不利于解决内部两大派思潮的联合，事情要慢慢地解决。这一学习方案，我认为是打迂回战，或者是边沿战。”余九乡不同意这看法。安静中出院后，对高说：“常委的学习班是别有用心的，是机会主义的，我们表态不如不表态更好。”

△安静中出院后，余九乡对高元贵说，《二团》在安静中家进行整风。高元贵给他献计，他说：“你们整风的结果，可以公布出来，借以争取群众。大批站虽然长期不活动，但还没有公开声明取消。我的意见可以由几个人出面公开声明解散，这样有利于解决大联合问题。到底由哪几个人，由你们（指安静中、《二团》）去商量。不能只由《二团》与《一月风暴》出面，因为成立时，除物探系外，各系都成立了。像《赤二支》这样的战斗队，无论如何要争取团结，不能只由《二团》和你少数人裸体跳舞。你们如脱离了群众，人家就把你们打成了反革命！”高元贵再次指使《二团》要注意争取群众，扩大队伍。

△在高元贵“要支持革委会开办的第一期学习班”的旨意下，《二团》于元月十日左右也出大字报“祝贺院革委会第一期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召开”。但认为：“这次学习班是回避了以聂树人、东方红报，东方红广播台为代表的和以发表《联合声明》的十五个战斗队等为代表的在地院尖锐对立的两派。是否能解决地院文化大革命问题，全院广大革命师生员工不能不表示怀疑。”这和高元贵所说的“这次学习班是打迂回战，打边沿战”何等一致。还说“有些人表面上也装出要克服派性，要大联合的姿态，而实质上死抱着派性不放”，“希望革委会负责同志和我们一道警惕在办学习班的同时，被派性控制了。如果人为地加深两派的分歧那就大错特错了”。

一九六八年二月至三月

今年二月初，社会上右倾翻案浪潮迅速升温，杨余傅之流以为时机已到，便四处活动，煽阴风，点鬼火，或策划于密室，或点火于基层，极力煽动右倾翻案妖风，拼凑队伍，蠢蠢欲动，妄图实现其篡权的罪恶目的。

我院的“二流”派也紧步社会上“二流”派的后尘，唯恐有些落后，又拉起了破旗，贼心不死，妄图为“二月逆流”翻案。在这短短的二个月里，他们跳得最高。由于他们反动的立场，克制不住对无产阶级司令部和新生红色政权的仇恨，

所以在倒谢运动中，他们是积极参与者，并写出了语言恶毒矛头指向谢副总理的“为什么？为什么？”“十二个为什么”等大字报。另就是极力破坏市革委会举办的学习班和我院毛着积极分子大会的胜利召开。

他们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以为这次可以大捞油水，达到分裂颠覆革委会的罪恶目的，孰不知是鸡蛋碰石头，只不过是更加速了他们的灭亡。

△市革命委员会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在“师大造反兵团”要求参加学习班的一封公开信发表后不久，我院《一月风暴》等十五个战斗队于二月中旬也写出“关于要求参加北京市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给中央首长的一封信”，恶毒地攻击革委会，又无耻地吹捧自己，信中说：“地院《东方红》的负责人出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立场，在去年一月风暴以后，一步步地背离了斗争的大方向……成为王、关、林、周景芳反党集团的忠实打手……”还说：“由于革委会某些人对蔡派采取高压政策，至使地院思想上严重分裂并导致运动的冷冷清清。一年多来的历史证明，不解决朱派蔡派的团结问题，不揪出黑手，不打倒派性，地院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不可能进行到底。”吹捧自己是“……在十分困难环境下，坚持了内部合法斗争，这就给北京市的学生运动树立了一个不拉队伍、又坚持原则的典型”。

△当革委会决定《二团》派二人参加市学习班之后，《二团》《一月风暴》又发表“关于参加市大专院校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声明”，声称“……院革委会某些负责人，伙同反革命黑手，长期压制打击‘蔡派’，在参加学习班的问题上又表现出来了。他们再次压制‘蔡派’战士，而市学习班只有二名，这是一个倒退。他又为破坏市学习班迈出了第一步。我们坚决反对……”

△二月底，周永璋等以《小小老百姓》《锔未残》为名，写了一张“也致中共地院核心组”的大字报，恶毒攻击王大宾同志，质问“……王大宾同志与朱成昭到底是什么关系？他追随朱成昭收集整理康老的黑材料，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交待了没有？王大宾在关、王、林、周、潘、吴操纵下干了哪些勾当？交待没有？认识怎样？……”

△ 1968. 3. 2.

△晚上，在东三楼 214 室安静中家，由安静中谈市学习班的情况。有二团全体，张台甫、余九乡、江祖如、邓兆伦、刘文华、郑雪禾等十七、八人。

安说：“王焕是核心组长，高元贵是核心组成员，高的态度倾向我们。”“李钟奇说了，师大造反兵团的事，他们不表态，师大的问题是由中央掌握的。”还造谣说：“有人讲新北大说谢富治停职反省了，因为考虑影响，还让他出来接见。”

当安静中谈到“王大宾对蔡新平讲，叫他回去一定给周永璋讲，不能反谢副总理”时。

蔡新平说：“谢富治有什么不能反，文化大革命初期政法学院的工作组也是他派的。”

刘文华说：“谢富治反正有问题。”

郑雪禾说：“对戚本禹、周景芳这些说法，至少也是个认识问题。”

刘文华说：“我看不至于吧。”

（在这之前，安静中已到黄占秋住处向机关有关成员介绍了学习班的情况）。

△ 1968. 3. 4. —3. 5.

△在市学习班，聂元梓召开第一次反谢副总理的串联会之前，《二团》方面在校内大造舆论，大量地转抄有关戚本禹的大字报，批判戚本禹的“三.五”讲话，目的是要把院革委会说成是关、王、戚的第二套班子。主要有：

1. “看戚本禹怎样参与关王庙反革命集团的阴谋”（地质系无产阶级革命派转抄于总队野战兵团）。

2. “戚本禹破坏我所和学部文化大革命的罪行必须彻底清算”（傲霜雪转抄于学部近代史所）。

3. “十个为什么”（一月风暴）。

其中第十问，明确地把院革委会和王、关、戚、林联系在一起：“为什么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首长不来我院，而王、关、戚、林反党集团的主子、奴才们却从不间断地出入我院，对我院表示极大的‘关怀’‘爱护’”。在这里恶毒地影射了谢副总理，真是罪该万死！

4. “戚本禹的‘三.五’讲话”（二团）。

其主要意思无非是革委会有戚本禹的忠实追随者，是受王、关，戚操纵的。

5. 地质系“无产阶级革命派”贴出大标语“斩断戚本禹伸进地院的黑手，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彻底铲除关王庙在地院的流毒。”

（录入者注：原件此处有缺页或掉字）

争不批判，却把斗争锋芒指向不同意见的高元贵同志，不在全院发动群众斩断黑手，围剿派性，打倒反动的无政府主义等等。”用这一系列问题说明我院革委会是“站在关王庙反动路线一边”，说明他们“在一系列问题上，包括对待革委会这个问题，也就是反对和捍卫革委会的根本的政治内容、态度问题上，立场完全是正确的，无可非议的。”

△《一月风暴》写出大字报，要“……我院某些负责人必须交出你们所整理的三军党委黑材料，彻底检查在三军问题上严重立场错误，特别是林副主席、周总理公开支持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以后，你们与‘冲派’的秘密往来”。

△ 1968. 3. 11.

△传达李钟奇副司令员的指示，市学习班接近尾声，有几个学校出大字报，表示反对。这时安静中说：“原来新北大是抵制学习班的，开始不愿来，现在聂元梓说‘既来了，就由不得你’（指谢副总理）。 ”

△ 3月10日左右

蔡新平给肖力同志写信，谈二月逆流的问题。他说：

“反击二月逆流的问题要一分为二来看，要分清主流和支流。我认为主流是正确的，因为当时的确有一股从右的方面来动摇无产阶级司令部、否定造反派的逆流存在，想搞反夺权，谭震林就是代表。反击二月逆流，基本上是无产阶级司令部引导下斗争的。但阶级敌人插手，他们利用这个反右的机会，又从左的方面来动摇无产阶级司令部，他们挑动小将把矛头指向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同志，主要想搞掉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老帅和几个副总理，他们的用意很明显，也很恶毒，就是想孤立周总理，想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把军队搞乱，他们的矛头最终指向毛主席、林副主席的。”

“余秋里同志当时是有错误的，但阶级敌人以极‘左’的面目出现，有些单位的小将搞过了头，走向了反面。应当正视这个错误，当时戚本禹把几个保余、保陈毅同志、反对搞副总理的组织（新北大公社，石油大庆、一外扛旗）打成保守组织是完全别有用心，这几个组织在这个问题上站队就是站对了。当时以师大井冈山为首的一些组织，谭厚兰等同志反谭震林是对的，但搞过了头，他们后来受这个反党集团的操纵，反几个副总理、搞陈毅同志就站错了队，她在这个问题上应作自我批评。”

△ 1968. 3. 15.

△市学习班召开倒谢形势串联会，余九乡在大会上发言。他说：“我院革委会是戚本禹派周景芳来，搞的一派的革委会”，“是追随关、王、戚、林的忠实打手”，攻击市学习班是“以派性代替一切，是戚本禹在我院搞的那一套的翻版”，还说“我院极左思潮严重”，“聂树人搞了一个自己批准自己入党的手续和不要预备期的极左的建党路线”。

△高元贵见余九乡在市学习班第二次倒谢串联会上发言，就对安静中说：“不能介入，谁介入就要犯错误”，想救安静中、《二团》一命。安静中说：“聂元梓的后台是三军，聂元梓曾说先不点名（指谢富治），等一揭再揭再说，到底怎样，将来看吧。”

△ 1968. 3. 16.

△《二团》《火星报》编辑部贴出“革委会必须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再论究竟是谁反对革委会”的大字报，再次把矛头对准院革委会和王大宾、聂树人等同志。如：“……革委会中的某些负责人在关王戚林反党集团的操纵下，

充当了干扰破坏毛主席战略部署的可悲角色……他们是错误路线的代表，丝毫不能代表革委会的革命大方向。……奇怪的是我院革委会中某些关王戚林反党集团的反革命路线的积极追随者，至今仍不悔改……在我们什么以‘斗私批修’为纲，什么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统统被置之度外（录入者注：此处语句不通，原文如此）。我院运动仍按聂主任的‘战略部署’进行。”

△ 1968. 3. 17

△化学教研室《红心向党》在转抄文汇报 3. 14 社论和清华井冈山关于陈里宁的材料时，陈莹对郑雪禾说：“赵国柱说，这次他们准备拉出来干了，叫我们做好思想准备”，还说：“兵团的人讲，王大宾是朱成昭的第二套班子，是三军里有人说的。”

△晚上在安静中家策划明天（即 3 月 18 日）冲会场即策划破坏我院活学活用毛着积极分子大会。

△ 1968. 3. 18.

△我院首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大会开幕。

大会召开前，《一月风暴》贴出“为什么？为什么？”的大字报，攻击谢副总理，煽动“倒谢”妖风。《春风化雨》贴出“无产阶级司令部挥手我前进——为反击‘为二月逆流翻案’的阴谋而战”的大字报，把矛头对准我院首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大会。文中写道：“……我院首届学习毛着积代会就要召开，同志们千万别忘了那些藏在阴暗角落里的朱贼分子们，他们会跳起来为‘二流’翻案，别忘了有脱离两条路线斗争把大会引向歧途的危险；别忘了有人任其派性发作，给革命的东方红战士扣上一顶大帽子；别忘了那些自身派性十足的人在不同意实行‘派性派诈’（录入者注：原文如此）。”

△《二团》贴出大标语，企图破坏我院首届积代会的召开。

1. 评选会大搞派性，不突出政治，掩盖两条路线斗争，是对毛主席的最大不忠。

2. 揪出朱成昭集团的变色龙，扫出关王庙的小爬虫。

3. 是揭开我院阶级斗争盖子的时候了。

4. 必须批判我院所谓首届毛着积代会的资产阶级方向！

△下午二点半，二团在北翼楼 303 讨论形势，由周永璋主持会议，有《二团》（除殷维侯之外），余九乡、张台甫、李振海、郑雪禾等廿多人讨论形势和拉队伍的问题。

蔡新平说：“王大宾和聂树人是矛盾的，聂树人要夺王大宾的权”，还说：“聂树入已经被我们搞臭了，现在要搞王大宾”，“把矛头对准聂树入，对王大宾不点名，提揪变色龙”。周永璋说：“提揪朱成昭的变色龙。”

对要不要组织起来、打旗号的问题，意见不一致。

有的说：就用《大批站》、《红二团》，反正过去已经打出去了。但又怕打出《红二团》的旗号，中间群众有戒心。有人提用“东方红红二团”，有的认为：“东方红不要了，地质东方红在外面已经臭了，人家还要揍你哪。”

最后决定：先让二团把打旗号的宣言准备起来，起什么名称，看形势再打出去。

蔡新平说：“等革委会成立一周年那天，把它打出去。”周永璋支持了这个意见。

余九乡提出“对我院毛着学习积极分子大会要表态，要批判它的资产阶级方向。”

在讨论如何解决我院问题时，周永璋说：“我看要解决地质学院问题，非来几场大武斗不可。”有的说：“来几场武斗也解决不了问题，只有靠外力来冲，看行不行。”

赵国柱在台上念了王、关、戚、林、周黑手插入我院的调查材料，并说：“王大宾说，自去年九月十六日以后，我院就没有与外面联系了。据了解到今年二月还有联系，王大宾还参加过青岛会议，为关、王翻案。”

△晚上，叶德隆对郑雪禾说：“看来有些材料（指攻击谢副总理）还比较过硬”，“你们要是出去，还可以写点报导，介绍各校的情况，让大家了解外面的情况。脱离当前阶级斗争，在这里开积极分子大会是不行的，我就不愿意当代表，这样自由些”。还说：“他们这些同学（指《二团》）不容易呀，条件很艰难，坚持着干。”

△晚上，《红心向党》贴出炮打谢副总理的《十二个为什么》的大毒草过后，陈莹转告郑雪禾说：“王暄堂讲，谢富治的问题真够严重的呀”，“吉让寿讲，你们这张大字报贴得太快了，应该看准了再贴出去。不过贴了也没什么了不起”，“他们讲，这下子可能把你打成个特务，因为从你的出身和爱人华侨”，“安静中说：没什么关系，你们就说对毛主席的热爱。”

△ 1968年3月20日

△在北翼楼303，周永璋主持二团召开形势讨论会。

会前，安静中对郑雪禾说：“他们（指二团）不要我们参加，你去吧”，还说：“聂元梓说过，运动发展到现在，再搞不能针对人，这话看来是对的。”

会上，周永璋说：“现在这时再犯几个错误就不行了，还是谨慎些好”，“关于老谢问题，可能有三种情况，一是坏人挑动的，一是无产阶级司令部挥手，一是错误地估计形势。据了解这次他们是开了会的，三军×××上学部，去了一趟后才搞起来的，现在我们就先看看，不要动了。”

肖体修：“我们过去有个缺点，跟老师接触得多，跟同学接触得少，老师顾虑多，什么也不敢动，我们不能老怕犯错误而不敢动，犯了错误可以吸取教训，可以改嘛。”

△ 1968 年 3 月 22 日

△上午，在王喧堂家（东三楼 315）召开形势讨论会。

有郑伯让、江祖如、叶德隆、刘肇昌、刘文华、周永璋、蔡新平等参加。

会刚开始，因地质公社要揪斗炮打谢副总理的反革命小丑郑雪禾，郑先离开了会场。

蔡新平说：肖力问你们的造反精神哪去了。你们对二月逆流怎么看法？回去写信告诉我。蔡说当时他没把这事看得很重，信稿写好了，在日记本中未发出。说到这里，郑伯让说：咳！这可误了大事了。

当谈到谢富治时，江祖如跳起来说：“他妈的，单凭这一条（指陈里宁事件）就够了（指打倒谢富治）。”

△反革命小丑郑雪禾被隔离审查。

△地院“二团”几个人竟把地院一派反击翻案妖风的大好形势，描写成是“地院上空乌云滚滚，一片白色恐怖”（安静中给中央文革首长未写完的信中），为疯狂地炮打谢副总理的反革命小丑鸣冤叫屈，反动气焰十分嚣张。

△ 1968 年 3 月 24 日

△3 月 22 日，反革命小丑郑雪禾被隔离之后，我院“二流”派慌了手脚，并为她鸣冤叫屈，连续发布许多严正声明。《一月风暴，秋收暴动，傲霜雪》严正声明要点如下：

（1）3.22 事件的主谋、策划者一直把矛头指向和刘、邓、陶、何、周、聂、王、关、戚、林反党集团做过坚决斗争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而是混进革命队伍的蠹贼、败类。（录入者注：原文如此）

（2）他们打着反击“二月逆流”的旗号，向着无产阶级革命派反攻倒算，大搞翻案、阴谋之实。（录入者注：原文如此）

1162.3《漫天大雪》和 1162.2《无产阶级革命派》的严正声明，基本内容、精神同上。

△ 1968.3.25.

△《红二团》发表“关于 3.22 反革命阶级报复的严正声明”要点如下：

1. 强烈要求驻院解放军和革委会严肃处理。

2. 所谓《二团》炮打谢副总理纯属无耻污蔑和造谣。

3. 材料我们的确整得有，那就是至今仍潜伏在革委会的追随王、关、戚之流，不悔改的反动分子、反革命罪行材料。这类材料，过去整，现在整，将来还

要整。

△《红二团》贴出口号声明

共五条：（录入者注：原文没有 1 至 3 条）

4. 紧跟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伟大战略部署，坚决击退右倾翻案风。谁妄图从右的和极左方面为“二月逆流”翻案决没好下场。

5. 毛主席挥手我们前进，我们将一如既往为捍卫以谢富治为首的市革委会的革命性和纯洁性战斗到底。

△ 1968. 3. 26.

△《二团、一月风暴、11622 无产阶级革命派》贴出标语口号：

“坚决要求革委会立即释放郑雪禾，为郑雪禾彻底平反，并公开向郑雪禾同志赔礼道歉！”